

《记忆》九十期

目录

【专稿】

李红云 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

【专题研究】

王 锐 “文革小报”的衰落和消亡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五）

【评论】

唐少杰 清华“二校门”的变迁

【往事】

王复加 一家三代 百年沉冤——王复加家族回忆录（节选）

【检查与交代】

周文英 我和杨炳炎的关系

【来信选登】

- 1、胡庄子转来“雄师”负责人的来信
- 2、阎长贵致李英美文
- 3、秋山枫叶谈李英美文
- 4、李英美来信

【专稿】

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

李红云

文革初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中央高层曾发生过重大分歧。这也曾是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

在1966年6月1日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出现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向大学和中学等单位派出工作组。7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此前的两次谈话，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¹

从工作组派出到工作组撤销仅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中央高层对文革理解、指导上的深刻分歧。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许多大学和中学，红卫兵和造反派与工作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一段历史，可以了解毛与刘邓在工作组上的重大分歧，以及后来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对整个文革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选择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以下简称“女附中”）工作组从派遣、开展工作到撤销的整个过程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女附中是当时北京市中学中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她不仅是当时北京录取初中高中学生分数最高的中学之一²，而且因其集中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党政军高层干部的女儿们而名声显赫。而文革期间女附中的工作组更是和邓小平有直接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笔者当时是女附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史实和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研究，这里使用的资料是公开出版物，包括注明“内部发行”但是公开的书面文字。此外，当时的原始资料也是本文使用的重要资料，它们是，1、文革中女附中署名“星火燎原联队”³于1966年10月后编辑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

¹ 参见郑谦、张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² 北京当时的教育制度是小学升入初中和初中升入高中均进行全市的统一考试。

³ “星火燎原联队”为女附中文革初期成立的一个以教师为成员的群众组织。

争大事记（1966.6.1-10.3）》（以下简称《大事记》）2、女附中高二学生罗治当时的笔记（以下简称“罗治笔记”）3、女附中高三年级一位学生的日记¹（以下简称“《日记》”）4、笔者的日记，以及女附中校友保存的一些原始资料。

本文的研究不针对任何个人，包括原工作组的成员。

一、工作组进校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其矛头直接指向被称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市委领导宋硕（宋当时任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称：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²

在当时新闻传播的手段仅仅是广播和报纸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号令。因此，6月2日传递的信息已足以让包括女附中学生在内的许多青年学生极度亢奋。文革中出版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中，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形势：“全国各地和北京市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烈火迅速在北京市和全国燃烧起来。”³

6月2日，女附中的三名学生预备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在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大字报指出：“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¹ 该日记为范世涛先生收集并保存。谨此致谢。

² 《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³ 佚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年7月-1969年4月）》，北京：1969年7月1日，第365页。

¹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并不十分清楚，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佩云的。²它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欢呼，有人质疑，也有人跟着贴出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会上，副校长胡志涛³强调要“一致对外”，“区别两类矛盾”。

6月3日早上、晚上都召开了党员大会，矛头对准了写大字报的三名学生党员。有学生撕掉了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⁴一时间，学校陷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⁵而此时，校领导的权威已经失去，校党总支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工作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派出的。

派工作组的决策过程，没有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大致的经过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整理而成。⁶

其实，在6月2日之前，中央已将两支工作组派出，即：5月30日派到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和6月1日晚十点多钟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两支工作组的派出是根据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开会研究，并经29日和30日请示毛泽东，获得毛的同意后派出的。⁷

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和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周恩来年谱》中有如下记载：

1966年6月3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八条规定。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⁸

¹ 见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47期，2010年4月30日。

² 胡志涛：《八五祭》，载胡志涛、丁丁：《生活教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66年。

³ 当时女附中隶属北京师范大学，未设校长一职，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为卞仲耘，胡志涛为副校长。

⁴ 星火燎原联队编：《大事记》，1966年

⁵ 详见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载《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另见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30日。

⁶ 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1页。

⁷ 同上，第131-132页。

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有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制定了“中央八条”；二是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其任务是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的意见是李雪峰提出，经与会者一致做出的。目的是要把学生限制在校园内，消弭动乱。¹并力图把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派工作组的决定做出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主要从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中抽调，中学的工作组由团中央抽调。

当时为什么要派工作组，据王年一分析，主要的依据是以下四点。

第一，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将要瘫痪，情况混乱。这是最现实的情况。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第二，广大师生员工要求派工作组。如北京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工作组去时，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第三，有例可循。毛泽东批准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和北大。第四，派工作组是传统的、惯常使用的工作方式。²

6月3日傍晚时分，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女附中，西城区工作组的负责人为胡启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是张世栋。³他们是在党员正在开会批评写大字报的三位学生时直接进入会场的，进来后他们宣布工作组正式进校，并对贴大字报的刘进等人表示了支持。并且说：“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你们做得对，你们做得很好。你们跟中央的形势跟得很紧，我们来和你们一起参加斗争，并且向你们学习。”⁴这应该是第一个进驻中学的工作组，也是继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后派出的第二个工作组。

6月4日，工作组进驻女附中，并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当日，罗治的笔记中记载：“张士栋领导的工作组来了，胡克实同志也来了！”《日记》的作者写道：“同学们高兴极了，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

5月版，第35页。

¹ 米鹤都：《心路 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第101页。

²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7页。

³ 据梅树民同志（时任女附中教导处副主任）回忆：6月3日傍晚，以胡启立为首的西城区工作组派了以张世栋为组长的五人工作组进入学校。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校史1917-2007》，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第138页。

⁴ 资料来源：《罗治笔记》。本文中提到的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于《罗治笔记》。

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新的战斗即将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始。”¹

6月5日以后,以北京新市委名义派出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京的大学和中学。

二、工作组进校后的情况

工作组进校后在6月4日和6月6日,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工作组成员作了讲话,并传达了有关领导同志的讲话。根据罗治笔记记载,工作组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1、工作组肯定了女附中的形势,肯定了刘进等人写的大字报。“大字报从总的来讲是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我们女附中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看了真叫人欢欣鼓舞。”

2、工作组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因为:“新的北京市委已经组成了,新的北京市委是选派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组成的。新的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改组了,《北京日报》已经是我们党的机关报了。北京市委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北京的群众和学生都要拥护新市委的领导。”

3、工作组注意了对学生的引导。“在问题没有弄清前,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希望同学们揭露具体事实,前一阶段我们义愤填膺,表明态度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但是光有热情,运动往往不能深入,我们要踏踏实实把教学中的黑线搞掉。”在细节上,工作组也告诉学生:“不要写人家的私生活,男女关系”,“这样容易转移目标”。“政治历史问题我们不要写大字报,这样容易给坏人钻空子,这样的问题要通过组织调查解决。”

4、在对待教师的问题上,工作组指出:“老师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要好好发动他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共同搞革命。”

在6月4日的会上,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还传达了北京市新市委领导召集北京市中学书记、校长、教师、学生代表的会议精神。在这次传达中,罗治清楚地记下了“中央八条”的内容。

6月6日,工作组再次强调:

¹ 女附中一高三学生的日记。

中央的八条规定主要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应该懂得什么事都有两个方面。纪律是要有的，不约束就乱了，约束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

有几点注意：

1、不要着急。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被贴大字报的人要不要表态，由他自己决定，这是决定他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的关键。

2、不要围住那些被揭的人。

3、要贯彻政策，不要打骂人。

遇事要沉着，不要盲动，干革命要有秩序。¹

6月6日，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代表会由七人组成：五名学生，两名教师。而最早贴大字报的学生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均为代表会的成员，此外两名学生是耿丽兰和尹斐。五人均为干部子女。这表明，工作组首先贯彻的是“阶级路线”。即：依靠红五类子女²（在女附中就是依靠干部子女），团结和教育其他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改造和斗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

工作组进校后，新秩序建立。原来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³在教师中也成立了核心组。

从上述情况来看，工作组进校后严格贯彻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尤其是“中央八条”，缓和学生与校领导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努力把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

6月8日、9日、10日，工作组通过各班的代表向学生布置了学习的要求：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武器，学习6月1日以来的社论。在大字报问题上，工作组主张“要提高大字报的质量”；“要好好讨论，要有材料，有分析”。同时，工作组再次强调，要“执行政策：不打人，不骂人。这是考验人的立场，考验你听不听党的话的问题”。

¹ 资料来源：《罗治笔记》

² “红五类”即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

³ 《记忆》第47期。

6月13日，即就是工作组正式进校后的第九天，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揭发批判了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河胡志涛。大会事先指定了八个人发言。¹会上，工作组这样总结了这一段的工作：

这几天运动怎么样？好得很！因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新的阶段：

1、广大师生员工对文化革命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并积极行动起来了，对修正主义黑线和代表人物进行大量揭发，大、小字报已经贴出一千多张了。广大师生员工行动起来了，勇敢批评。

2、建立了师生代表会，把革命的师生组织起来了。

3、从6号开始上课。文化大革命、上课和学毛选等，建立了新的革命的秩序。

4、出现了一大批有材料、有分析、有分量的切中要害的大字报。斗争水平和战斗力不断提高。

5、广大师生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有了飞跃的提高。几天的进步超过几年。立场坚定了，斗争性增强了。

6、取得了一些经验，为下一步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²

在这次总结中，工作组再次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央八条规定，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新的革命秩序。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斗争，提高战斗水平。”

6月15日，工作组西城工作队队长胡启立指示工作组要在教师中“排队”。所谓“排队”，实际就是沿用“四清”³运动中的做法，将学校中的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即：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⁴

这一阶段（6月3日——6月16日），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工作组在进校后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贯彻执行“中央八条”，支持并依靠了

¹ 见星火燎原联队编：《大事记》，1966年。

² 资料来源：《罗治笔记》。

³ “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⁴ “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载《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日报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第693页。

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立了师生代表会，基本控制了局面。

三、揭批开始

然而，“风平浪静”只是暂时的，既然是“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暴风骤雨”终究是要到来的。

帷幕终于拉开了。

6月12日，南京大学率先举行万人大会，揪斗了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¹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党团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发生了往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情况。当时情况比较混乱。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²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批语中指出：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³

当时女附中的情况基本稳定，6月17日，工作组通过广播向全校发表讲话称：“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有很多人的意见还没讲出来。……因此现在仍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只有搞好这点，才能领导同学更好地有重点的揭发批判。”“希望一切革命的师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评论的高潮。”⁴同时，工作组也提出：

¹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

²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载《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日报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第663页。

³ 见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4页。

⁴ 资料来源：《罗治笔记》。

怎样进行普遍广泛的揭发批判呢？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愿意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只要你感到他有问题，就可以揭。大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任何人都可以揭发批评。可以提不同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是非。我们提倡大家辩论，揭发批判的形式可以随便点，可以自己搞，也可以几个人搞。¹

6月19日，胡启立在女附中讲话说：

我们进行的是三个揭发：1、揭发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及其领导。2、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3、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我们师大女附中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其它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切东西也都有揭露，但有关主攻方向——清理党的领导核心。……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称：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²

按照工作组的布置和社论的精神，女附中的大字报已是铺天盖地，矛头指向了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校领导。

6月20日女附中全校开会，刘进代表师生代表会讲了三意见：“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工作组成员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

¹ 另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校史 1917-2007》，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第139页。工作组讲话内容基本相同。

² 《人民日报》，1966年6月20日。

“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¹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这是文革开始后女附中召开第一次针对校领导的批斗会。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被批斗的人有：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女）、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其中卞校长站在台上，其余四个人站在台下。在这次揭批会上，除几位教师发言外，还有校外一个叫袁淑娥的人发言。袁系女附中一教师的前妻，文革前因私人问题就对卞校长有意见。袁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学生，并激发了她们对卞校长的仇恨。

在会议结束的总结中，工作组宣布：“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并经请示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开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召开，会议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卞仲耘。此前校园中已有一位管过人事的教员贴出大字报，揭发卞仲耘是假党员。这张大字报再次点燃了学生仇恨的烈火。两次揭批会都有一些暴力行为。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还是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

这段时间，按照工作组的部署，不管是教职工还是学生，只要有问题就可以揭发，在学生中已经出现学生揭批学生的情况。例如，6月18日，高二二班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²：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 xxx 及其爪牙 xxx；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 xxx；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 xxx、xxx；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 xx；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 xxx；一贯与组织对抗、对党不满的小市侩 xx；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 xxx；

¹ 资料来源：《罗治笔记》。

² 罗治保存并提供。

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 XXX、XXX、XXX 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窜下跳，企图混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队伍。警告你们，浑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署名“毛主席的共青团员”。这张大字报点了 12 个学生的名字，给她们扣的大帽子足以使她们被认定为阶级敌人。

初中的同学因为年纪小些，她们还没有使用太多阶级斗争的词语，但火药味也是相当浓。例如，6 月 23 日初二五班在教室里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写的¹：

同志！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要推翻我们的政权，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这就是一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但是，在我们班还有的同学没有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态度不鲜明，有的人在平时不爱说话，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还是不言不语。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更可耻的是，有的人还从个人利益出发，想在这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中投革命的机。这简直是用毛主席的生命为自己换取政治资本。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真正的革命同学，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两张大字报都使用了相当极端的词语，表明女附中的学生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她们心中的革命运动中，并以极端的、近乎狂热的语言把矛头对准她们所认为的敌人，不管这个敌人是谁，哪怕是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

以上情况表明，在揭批开始之后，特别是在有重点的揭发批判之后，女附中的形势实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工作组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混乱已经开始出

¹ 笔者的日记。

现。6月25日，工作组布置了批判卞仲耘的“十天计划”，即从6月25日至7月5日，分为“两个战役”。第一战役（6月25日至7月1日），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学习社论。讨论的问题有：结合实际讨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怎样保证、体现党的领导；怎样团结大多数；怎样主动贯彻党的政策；斗争目的等。在班级的揭发批判后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第二战役为7月2日至5日，先召开班级的揭批会，然后召开全校的揭批会。并在27日宣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要的“八大罪状”。¹

此时，工作组的斗争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已经决定了卞仲耘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的在劫难逃。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劫难逃的还不只是这些人。

四、反工作组

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毛指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²表示了不支持，但是也没有明确反对派工作组。

在工作组进入女附中两周之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位同学贴出了题目为“我校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³大字报质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指出工作组进校以后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而不是轰轰烈烈。

在文革中编辑印刷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1966年）6月17日 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小将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X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

¹ 见星火燎原联队编：《大事记》，1966年。

² 黄峥：《刘少奇》（下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368页。

³ 见星火燎原联队编：《大事记》，1966年。另一说法为大字报的题目为“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见《记忆》第47期。本文采用《大事记》的提法。

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¹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公开反对工作组，发生时间甚至早于一些知名的大学。例如：6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17人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同日，北京地质学院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6月21日，清华大学蒯大富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6月24日，清华工作组宣布向工作组夺取是反革命行为。

6月17日的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就引起了全校的激烈辩论。辩论一直进行到深夜，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辩论中出现了围攻、谩骂、乱扣帽子的现象。《日记》的作者记录了自己对大字报的态度及全校的反映：

我看到了张大字报，同意。意见是打中要害的，提到了工作组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深入群众等许多原则性问题。尽管语气过火了些。

万万没想到这张大字报竟引起了大风波。全校多数人反对，少数人同意。当晚，大操场自动召开了一个‘辩论会’。所谓辩论会，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斗争会。高三四班十三个人和我们（高三四支持者），公然被称为反对学生、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会场气氛紧张至极，有的同学甚至挨打，工作组并未制止。

18日，辩论继续进行。《日记》作者写到：

上午，又有一个全校性质的斗争会，气氛较之昨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大喊大叫，把高三四的同学拉上拉下（台子有一人多高，人们根本不管这些）。许多口号都是从未听过的“不许动工作组一根毫毛”，“混蛋”“王八蛋”的叫骂声从未停止过……。这哪里叫什么辩论会！

从《日记》作者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当时女附中的情况，反工作组的同学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她们中的一些人跑到团中央反映情况并寻求帮助。团中央的同志接待了她们并“看了高三四的大字报，连声说好。”“被骂为‘反

¹ 佚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年7月-1969年4月）》，北京：1969年7月1日，第368页。

革命’的我们听到这些激动得几乎落泪”。¹

6月19日清晨，语文组教师王瑞光、曾恬贴出大字报，支持高三四班13位同学的大字报，并到市委及团中央反映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²19日上午和下午又进行了全体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参加的辩论会。辩论会对立情绪严重，有过火行为发生。

针对学生反工作组的大字报，6月19日胡启立来到女附中讲了几点意见，他说：

对工作组的意见有争论，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笼统统统，要加以具体分析。……我们允许不同意见也发表出来，这不是坏事。……怎样对待争论？1、态度：正确的、错误的话都要听，都要等人讲完（二十三条规定的），然后把各种意见摆出来，进行争论。2、方法：抓大是大非，不要抓小是小非。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一定要抓大是大非。……3、在辩论中，我们不要过急过早地下结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问题，统一思想。³

6月20日，工作组对全校讲话，明确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表示了欢迎，他们承认在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欢迎全校师生员工对工作组加强监督。“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由此可见，女附中工作组对突然出现的反工作组情况采取了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善意理解了反工作组的情绪并尽力采取缓和的方法解决矛盾，同时尽力要保证运动的大方向不被干扰，于是才有了6月21日、22日对卞仲耘等的揭批。

在6月21日，胡启立再次向全校师生讲话。他再次承认工作组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成绩方向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与革命师生发生一定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

斗争的目标仍要指向学校领导中的牛鬼蛇神，也要批判钻进党内的反

¹ 参见《日记》1966年6月18日。

² 见星火燎原联队编：《大事记》，1966年。

³ 见《罗治笔记》。

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斗争目标必须明确，重点必须鲜明。同学中大量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极个别的有反动言论，极右思想，但不能把矛头指向他们。……对于工作组和同学之间的大量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判——团结的办法解决。¹

6月23日，工作组再次强调革命师生要团结一致，“斗争矛头应该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而不是针对同学们，在同学中不能乱批乱斗乱扣帽子。”

6月25日，工作组传达了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的报告。主要内容是：1、工作组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在新市委的领导下，在运动中间不断进步，不断提高；2、党中央委托团中央组织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体现了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中有不一致意见，加强党的领导就可达到目的。²

然而，工作组的报告并没有使反工作组的声音停止。6月25日，以高三三班梁二同为首的18人（都是高中学生）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³指出工作组斗争卞仲耘的“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她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但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

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刘邓派出工作组，当然不是要对抗毛泽东，压制群众运动，而是沿用了中共历史上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土改、三反、五反、四清都派了工作组。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直到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该通知强调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该通知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⁴因此，毛泽东在6月30日之前都没有反对派工作组。

在女附中发生反工作组之后，北京的许多中学和大学都发生了反工作组的情况，到了6月23日，学生与工作组的对立已相当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北京市

¹ 见《罗治笔记》。

¹ 见星火燎原联队编：《大事记》，1966年。

¹ 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时间，《大事记》记载为6月25日。另一提法为6月27日，见《记忆》第47期。

¹ 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4页。

委及时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这些问题。6月23日，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议上做报告，谈了反工作组问题。他指出，多数反工作组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确有坏人“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要求“反干扰”，不反干扰，不反对反工作组，学校情况一片混乱，工作组难以立足，运动失去领导。¹

根据《罗治笔记》的记载，李雪峰的23日的讲话在6月29日由工作组传达。《罗治笔记》详细记下了讲话的全部内容。

另外，据米鹤都《心路：共和国同龄人》一书中称，对反工作组问题，有关中央领导指示：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²由此可见，在李雪峰讲话之后，对反工作组的人，是要按反革命来处理的。这项政策并不比“反右”运动的措施更宽容。也正是在6月23日，据当时北京的24所高校统计，被工作组认为是反革命、右派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就已高达10211人，其中学生5611人。³

女附中的学生中是否有人被认定为反革命，还不得而知。但也许是考虑到女附中学生的家庭背景（高三四班13人和同意高三四大字报的，除二人外，皆为干部子弟）⁴，对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他们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实际上，工作组进校后就贯彻了阶级路线，很注意做学生中的一个群体——干部子女的工作，笔者7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听了老马同志传达的胡启立同志的报告，才感到党对我们革干子弟期望特别高，希望我们在斗争中站稳立场，做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思想下进行的，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我一定好好学文件，做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

从笔者日记来看，工作组是对干部子女提出了特别的要求的。这无形中加深

¹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33页。

² 米鹤都著：《心路 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第102页。

³ 同上。

⁴ 见《日记》，1966年6月19日。

了学生对家庭出身的意识，为日后“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女附中的学生能率先反对工作组，有没有人幕后操纵或指挥，她们反对工作组与家长有无关系？从目前的资料看，还不能确定这一点。但在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出之后，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经常不来学校了，她们与海淀区的学校，包括大学有了来往。6月30日，在工作组的谈话后，两位反工作组的高一学生交出了清华大学后来成为著名造反派的蒯大富写给她们的信，但信的内容不详。这证明有些学生与蒯大富有联系。在7月8日工作组的讲话中称，女附中反工作组的幕后人物是清华的蒯大富。¹

7月5日，师生代表会贴出大字报，要求群众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表示态度，随后全校展开讨论。工作组做了开展辩论的动员报告，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²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开了三个半天的辩论会。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郑中伟、王南芬等人。在7号的辩论会上，梁二同声明不能参加辩论，郑中伟中途退场，以示抗议。³

这次辩论结束后，反工作组的事情基本划上了句号。反工作组的同学中有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如《日记》的作者写到：“我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脱离工作组，脱离群众，没有积极参加斗卞（仲耘）”。但她们在班里也被孤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五、邓小平与女附中工作组

由于当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笔名“毛毛”）是女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因此，邓小平选择了女附中作为他直接了解文革情况的一个点。类似的情况是，刘少奇因其女儿在师大一附中学习，他选择了师大一附中作为他了解情况的点。此外，刘少奇还于6月19日，派其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帮助指导运动。

根据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以下简称“文革文库”）所载的资料，邓小平对女附中的文革有过三次指示或谈话。分别是1966年6月2日、6月28日和7月5日。“大事记”也记载了邓小平对女附中文革的三次指示，后

¹ 见“大事记”。

² 见“大事记”。

³ 见“大事记”。

两次的时间与“文革文库”完全相同，但第一次的时间不同。按照“大事记”的记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第一次向工作组传达邓小平指示的时间是6月23日，但是没有具体内容。笔者暂时采用“文革文库”提供的时间。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女附中文化革命运动对邓榕的指示是这样的：

乱就乱一下子，不要怕乱，坏人兴风作浪，不怕，让大家贴大字报。至于对不对，将来要核对领导的性质，不对再改，不要怕。

你们现在的缺点是没有把性质弄清楚，不要所有的老师都打击，不然将来学校没法办。大字报要贴准，不要不注意，哪个老师都贴，不要什么目标都打击。

不要着急，现在不要做检讨，运动要有秩序地进行，要动脑子考虑好，动脑子犯错误，比糊里糊涂犯错误好，要好好考虑问题。

这样做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对了，如果不是敌我矛盾就不好了，但是也没有什么错。对了最好，把运动带动起来了，也许搞得不恰当，但也没有什么错。不要跟他们吵，让他们贴，让他们放，如果都不出来，让谁办呢？要好好学文件。

不怕错，错了就承认嘛，错了就检讨嘛！¹

邓小平第二次指示是在1966年6月28日。当时女附中已有学生开始反对工作组，工作组也已组织召开了针对校领导的揭批会。据“大事记”记载，邓的这次的指示是由邓榕向工作组传达的。在这次指示中，邓小平说：

可以和他们（指反对工作组的学生——笔者注）展开辩论，规模不要大，但也要有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要以理服人，不能压服人。开会之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要骂他们，不要让他们站着低头，要和他们说理。

¹ Song Yongyi (editor in chief),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Published by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2006(second edition)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慢慢要把党团组织逐渐恢复起来。在团内也可以受教育，可以过组织生活，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左、中、右都让参加，都受教育，右派不来，正好暴露自己。可以改组团组织。

传达雪峰同志的报告要分步骤，先给骨干后给党团员，对不同的人讲得内容不要一样。对一般人只讲政策，不讲策略。

不做老师的工作将来谁教课？要吸收教师参加革命委员会，现在你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老师中没有左派，老师这方面的工作差。老师的工作也应让学生去做。老师中一个积极分子也没有怎么行呢？要向老师交代政策，他们都怕，不知那天就会斗到自己，怕揭露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挨骂，帽子越戴越大，要再三向他们讲政策。

有很多人听了就揭露东西了。要争取老师，老师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大量的中间派，要团结他们，让他们革命，讲政策的目的是要分化他们，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觉悟，消除顾虑，团结多数。¹

文革中编辑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对此次讲话也做了记载：

6月28日 邓小平对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发出黑指示，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要过早恢复党团活动的指示，提出“要把党团恢复起来”。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如果这次运动是把共产党和青年团都打垮，那还是胜利吗？”²

从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到邓对待女附中文革的基本态度。对反对工作组的学生，邓采取的是相当温和的态度，要“以理服人”，不要打骂。值得注意的是，邓主张逐步恢复党团组织，表明他仍主张这次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他看来，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其地位也是不能动摇的。

邓的讲话中还出现了一个词“革命委员会”，这应该是在工作组领导下逐步建立的一个机构，目的是逐渐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根据“大事记”的记载，女附中于7月13日成立女附中“革命委员会”，委员十五人，其中教师二人，职工

¹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2006年。

² 佚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年7月-1969年4月）》，北京：1969年7月1日，第369页。

一人。

邓小平的第三次指示是在7月5日的上午，由工作组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带着师生代表会的学生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邓小平家中直接向邓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邓榕在其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到了这次谈话，但谈话的时间她错写为6月4日。¹她写道：

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²

邓小平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党团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邓说：“把党都搞垮怎么行？把团搞垮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邓的话是针对在海淀区一些学校出现的红卫兵组织说的，他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是：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

¹ 据《大事记》记载：“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刘进、宋彬彬向邓小平汇报了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听取了有关指示。晚上召开了全体工作队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另根据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载的内容和时间，此次谈话是1966年7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校史1917-2007》一书，也认为邓榕写错了时间，此次谈话应7月5日。见该书第142页。

² 这次谈话内容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页。另可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

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¹

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他也明确反对打人、变相肉刑、戴高帽子等行为。

6月20日、7月11日，刘少奇与师大一附中工作组谈话。据“大事记”记载，7月12日，工作组副组长向全体工作组成员传达了刘少奇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

刘少奇在7月13日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

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个任务。要不工作队走不了。不完成这个任务，将来学校由哪个来领导。²

由此可见，刘少奇的想法与邓小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强调党的领导，并未认可一些学校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女附中文革的直接关注和指示，女附中工作组进校后支持和依靠了最早贴大字报的三位同学，因为她们三人都是预备党员，而且在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并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或许是女附中红卫兵成立较海淀的学校晚的原因。

六、工作组后期的工作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

本文所称“工作组后期”是指7月10日至29日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组宣布要掀起一个“揭批高潮”，要求教师下到班级，

¹ 参见《记忆》第47期。

²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日报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第687页。

宣布教师是“四清”对象，让学生揭批老师。并于7月13日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师生代表会”。

正是在这段时间，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实际是共青团中央）制定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以下简称“《规划》”）。1966年7月13日讨论时刘少奇作了指示，送审稿标明时间是7月14日。¹这份文件集中体现了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文革的认识及其对运动的基本思路。该文件因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而流产。

工作组后期的工作，基本是按照《规划》进行的。

《规划》由“形势”、“目的和要求”、“办法”、“政策”、“整党整团，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团组织的助手作用”、“自始至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工作队的革命化”七个部分组成。其基本的思路是：以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中学文化革命的总纲。整个运动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斗争；第二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育和学制改革。”

在具体作法上，《规划》提出了三种办法进行：

第一种：以校为单位开展斗争。“斗争的办法是：首先在适当场合，让教师洗手洗澡，解放大多数，然后，团结全体革命师生，通过师生代表会，大、中、小会结合，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者，先斗争重点人物，接着解放多数教师。”

第二种：分批集训（即几校联合召开师生代表会）。其中提到，“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放假，教师、学生代表集训。”“学生代表主要是左派，也吸收一些中间派参加，由各班推选或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提名的办法确定。”

第三种：区、校活动，两者结合。总起来说，全市的中学，第一阶段的任务可有一百多个学校参加，于八月底基本完成，其余学校九月底基本完成。初中争取九月上旬至迟十月一日以后能够恢复上课。

在政策方面，《规划》提出“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即：好的、比较好的、

¹ 《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全文载《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日报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第692-701页。刘少奇在讨论该文件时的指示载该书第687-692页。

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其中“对性质严重的，也就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痛驳他们的谬论，清算他们的错误，撤掉他们的职务。”

对于组织工作，《规划》考虑的是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团组织的助手作用。逐步实行工作组、党支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

根据《规划》，在揭批高潮之后的7月18日，工作组分别召开了军训，集训的动员大会。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邢台军训，初一、初二的学生放假。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全体教职工和部分学生代表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根据“大事记”的记载，军训和集训是7月23日开始的。笔者日记的记载，初中一、二年级开始放假的时间是7月27日。

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写了集训的情况：“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

根据《规划》的要求，卞仲耘等被定为“四类”干部，即“性质严重的”，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还有一个名字——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就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¹

总的来看，《规划》照搬执行了“四清”运动中的那套作法，将干部分为四类；在工作方法上，用军训、集训的方法，目的是尽快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

《规划》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建立起来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的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把他们的活动逐步统一到党团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活动里来。经过运动考验，可以吸收他们当中优秀的革命分子为党、团员。

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一些学校已建立红卫兵组织说的。《规划》表明，它的制定者并不赞成成立红卫兵，而是希望把红卫兵这种自发建立的、无序的组织融

¹ 《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全文载于《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日报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第692-701页。

入到党团组织中来。对于共产党而言，在其理论领导上，不能容忍存在“脱离组织领导的群众”，更不能容忍出现“失去组织控制的群众运动”。这种态度显然与红卫兵的想法是对立的，难怪许多红卫兵要起立“造工作组的反”。与城区的中学不同，在红卫兵发源地的海淀区的学校，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对立是很普遍的。

7月23日军训、集训的师生走了之后，混乱了一个多月的校园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随处可见的大字报表明，这已不是以前的校园了。留在学校里已经学会了说脏话的初中学生，穿衣打扮也要尽量像个“革命者”。不仅有人穿起了旧军装，还有人为了锻炼革命意志，整天不穿鞋光着脚在校园里跑来跑去。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心已经被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燃烧，再也无法平静了。

笔者7月2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暑假又开始了。过去我特别想放假，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愿意放。真他妈的没意思。在学校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可是院子里冷冷清清。”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赶上一场革命的学生，此时的失望是十分明显的。但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一切都变了。

七、撤销工作组

根据现在的资料，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大致是这样做出的。¹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²但他最初并没有提出撤工作组。直到7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时，其中还提出：“采取抽调干部支援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此仍表示同意。³

7月13日、19日、22日，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编会时，三次对工作组问题提出非议。但在这几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马上就撤销工作组。

¹ 笔者主要参考的资料有：郑谦、张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39—41页。黄峥：“刘少奇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载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1—139页。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0页。

³ 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6页。

7月24、25日，毛泽东先后找一些人谈话，再次对前一段的运动情况提出批评，明确提出要撤销工作组。¹

7月26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两次讲话的内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7月28日，由中共中央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²

突然出现的变故使得在马神庙的集训在7月28日中止，当晚，部分师生参加了在音乐堂开的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会上肯定了北京四中关于要不要保姆工作组的倡议。该倡议的要点是：1、革命的路自己走，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辩论革命师生要不要工作组；2、罢胡启立的官；3、军训、集训暂停，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³

7月29日参加集训的人员返回学校。

7月29日在人大大会堂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表露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困惑心情，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就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以后，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⁴

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女附中学生邓榕是这样讲述她当时的感受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

¹ 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在1967年2月佚名编辑的一本《资料汇编》中有记载，见该书第322页，但时间注明是1966年7月下旬。

² 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7页。

³ 见《大事记》。

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1

邓榕作为邓小平的女儿可能会体会到父辈的“抵触和无奈”，但更多的人感受不到这点。更多人感受到的是茫然，他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茫然之余还有兴奋与激动。因为，毛泽东在会场出现了。毛泽东的出现令他们“心潮澎湃”，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让这些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做出的任何决定，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另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邓榕文中所说她参加会议的身份是“学校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如何如何是不准确的。理由是：1、没有证据表明7月29日之前女附中已成立了任何形式的红卫兵组织。2、红卫兵组织虽然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已经成立，但在7月29日它并没有合法地位。毛泽东的支持也是在此后的8月1日。所以不可能有人是以红卫兵的身份参会的。

根据《大事记》的记载，女附中在7月13日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堂会议的“一个造反派也没有，而是革委会的原班人马”²。另据一女附中校友提供的资料，革委会的成员有：刘亭亭（初一）、蔡竖平（初二）、杨东荣（初三）、邓榕（高一）、孙阿冰（高一）、郭松平（高二）、耿丽兰（中五实验班）、雷元（中五实验班）、尹斐（高二）、刘进（高三）、宋彬彬（高三）、马德秀（高三）、赵德顺（工友）、李松文（教师）、陈云兰（教师）。³根据这份名单，邓榕是革委会的成员。

¹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 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页。

² 见《大事记》。

³ 该名单由一女附中校友提供。名单中有15人，基本构成为：初中每年级一名，高中（含实验班）每年级二人，高三年级三人。这份15人的名单与《大事记》中所称革委会为15人相符。

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把7月29日的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师大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工作组一撤，真正的暴风骤雨就来了。

八、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女附中工作组是文革开始后继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后向学校派出的第二个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支持并依靠了最先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并按照以往的做法，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在女附中主要体现为依靠干部子女。

工作组将运动的目标锁定为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女附中领导。召开揭批会，已有暴力倾向出现。

女附中工作组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开展工作，主张依靠党团组织，不主张学生自发建立群众组织。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没有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红卫兵的组织。

6月17日，女附中在全国率先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在校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目前资料表明工作组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与温和的态度。

工作组执行《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精神，采取了对学生军训，教师集训的方法，初一初二学生放假，目的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这段时间内出现暴力倾向、为后来的暴力埋下了祸根。

其实，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都酝酿了后来大动乱的爆发。工作组在时，一切还能控制，工作组撤销之后，一切都变得无法控制了。女附中的情况如此，北京，乃至全国的情况亦然。

【专题研究】

文革小报”的衰落和消亡

王 锐

1、1968年，小报渐成明日黄花

如果说，1967年是“文革小报”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的话，到了1968年，则是其高潮已退并且逐渐走向衰落的一年。从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情况来看，各种小报仍然在编辑出刊，甚至也还有新的小报，在创刊问世，但就其总体趋势来讲，小报发展的高峰期已过。而且，就其出刊品种、数量、出刊内容、出刊周期，以及受社会的重视欢迎程度，对局势的影响力等几个指标来衡量，“文革小报”已明显显出将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的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向已成大势，并无可逆转。

由此，经历了1967年的极度兴盛繁荣过后，1968年将注定成为“文革小报”走向衰落的转折年头。

早在前些年，笔者在为自己的“文革小报”藏品制作分类卡片时，就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笔者收藏的数千份小报，其中1967年出刊者，占绝大多数，1966年出刊者极少（其时，多数小报尚未创刊），1968年及以后出刊者也不多，说明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就已陆续有一些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终刊。1968年停刊的则更多。为此，笔者还特意将除1967年出刊之外的小报，分为“1966年刊”、“1968年刊”、“1969年刊”及“1970年代刊”几个时段。将这所有时段的小报全部加起来，其总数也仅仅相当于1967年出刊小报的几分之一。这种数据对比，也有有力地佐证了自1968年开始，“文革小报”走下坡路的事实。

其实，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衰落迹象，早在196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有所显露了。那时，已经有部分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实际是终刊）。在本书《停刊号、终刊号和改刊号》一章中所提及的“停刊”、“终刊”的小报，以及笔者所收藏的其他“终刊号”、“停刊号”，好些就是在1967年下半年停刊终刊的。

进入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从初始发动并渐成风暴的1966年，再经历大夺权及全面武斗为主要特征达到高潮期的1967年，转入了潮

头渐落的休整期。尽管从10年文革、10年动乱这个总的历史阶段和大格局来衡量，1968年远没到文革的结束阶段（或者称为文革后期），但无论是从中央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设想意图（当时叫“战略部署”），还是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局势的走向来看，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已经明显失去了推动其向前发展深入的动力。

其实，按毛泽东最早的构想，文革运动应当在1966年末或1967年初结束，最起码该进入收尾阶段。早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对“文革”运动时间作了预期，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¹而此前10来天，叶剑英在小组发言时也传递过毛泽东类似的意思：主席说（指毛泽东），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²也就是说，按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文革运动搞到1967年初，就大致见分晓，该收尾结束了。但到了1967年初，因“一月风暴”引发的大夺权，全国局势大乱，其混乱程度及局面的失控，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自己的预料和估计。不得已，毛泽东一改当初不准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下令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控制或接管局势（有些省、区，干脆直接军管）。同时，毛泽东也自动调整了对文革进程的估计和预期。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和巴卢库等人，谈及当前文革局势时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完成，大概二、三、四这3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更长。³再以后，毛泽东干脆将整个文革进程归纳为“一年发动，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

也就是说，不管按哪一种说法，1968年都将呈现出努力将文革运动“收尾”的一种趋势。也正由此，1968年1月1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才代表中央发出这样的号召和指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

¹ 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神州激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² 同上。

³ 同上。

大斗争已经开始了。¹

社论还由此提出了 1968 年的几大任务：第一，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第二，深入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和三结合，开展斗批改；第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第四，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

从这些任务看，1968 年欲将文革运动努力收尾，是中央高层及毛泽东很明确的目标和意图。这也由此决定了 1968 年整个局势的走向。在这种大背景下，前些年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造反派，不管情愿不情愿，将从整体上开始走下坡路已成定局。

红卫兵、造反派自身处境如此，代表其立场，充当主要喉舌的小报，也自然处境不妙。衰落迹象从 1967 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许多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终刊，能继续坚持出报者，多是有某些背景，被地方当权人物认可或暗中支持的。但从整个局面看，小报出刊周期和数量都大不如前，特别是内容方面，少了那些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甚至左右舆论的文章及报道。给人的感觉，一年半载前轰轰烈烈繁花似锦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逐渐成了明日黄花，过去那些辉煌的日子已经远去，而且肯定不会再来。

当然，也还有在 1968 年陆续创刊的小报。不过，若对其作一番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新创刊小报，一是数量很少，比之 1966 年尤其是 1967 年的创刊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二是这些新创刊者，其中大部分是在原小报基础上的变异或是因派性斗争导致内部分裂而另拉队伍，另树山头办起来的；三是其寿命普遍很短，大多数仅仅出了三几期便停刊。

2、中央从经费着手对小报进行限制

1967 年年中，“文革小报”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期，但也是从 1967 年年中开始，中央在对红卫兵运动实施策略性控制和引导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似乎已泛滥成灾的小报，采取种种措施予以限制和规范。

中央最早对小报采取的行动，就是 1967 年 5 月 14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¹ 《人民日报》，1968 年 1 月 1 日。

的《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主旨，是试图对小报提出一定的“改进意见”，让其执行，使之纳入统一的比较规范的报刊宣传管理工作管理范围。但是，正如前文已述，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这份文件下发后的效果并不理想。红卫兵、造反派们，仍是自行其是，小报泛滥的状况并未遏止。

有鉴于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高层决定从经费方面着手，从资金来源上对小报的出刊发行予以限制。在中央授意下，最先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活动经费（包括小报出刊经费）采取实质性限制措施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公告有10条内容。其中最重要和与小报有关的是这样几条：

一、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要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按月编制预算和决算。每月的财务预算，要首先经过本单位核心小组认真讨论，然后报经市革命委员会主管部门批准。

二、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财务开支，只限于在本单位财务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不准另增加预算，要严格防止挥霍浪费。

.....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¹

可以看出，这个《暂行规定》对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限制和打压，是实质性的，它是从经费这个重要源头上，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活动和行为（包括编印出刊小报），实施根本性的控制和限制。既要有预算和决算，又要层层审批，而且仅限于本单位范围之内。对小报，更是致命性的打击，要求其“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报刊要求自收自支，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是无法做到的。这就等于变相宣布各种小报的死刑。

大概是为了强调北京市革委会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中央的意思，或者说，也是为了将北京市这些限制措施，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广，中央于1967年8月14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最高形式，

¹《文件选编》第160页，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编印，1969年1月。

正式转发了北京市革委会这个《暂行规定》。

中央在转发通知中明确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结合该市的具体情况，作了“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现将这个暂行规定随文附发给你们，希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的精神，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节约经费开支的措施。¹

为了表明中央对这些限制性规定执行的决心和强调，几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8月20日联合发出“中发（67）26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第11条又再次谈及小报等问题：

十一，各单位必须尽量节约文化大革命经费的开支。各种宣传品的印刷应当讲求实效，避免浪费。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应当以收抵支。写大字报、大标语应当注意节约，并尽量利用废纸和其他代用品。²

3、地方当局对小报的限制措施和打压

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包括在红卫兵、造反派中享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下发相关文件，已经明确表明了对小报严厉的限制态度。虽说没有立即对其全面取缔，但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源头上断其办报经费，让其难以生存。中央既已明确表态，各地方当局自然紧跟，纷纷出台相应措施，对小报予以限制和打压。

仅以全国小报最多的省市，四川省和北京市和为例。

¹ 《文件选编》第160页，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编印，1969年1月。

² 以上《文件选编》第8页。

早在“一月风暴”后不久的1967年2月中旬，四川就曾以省财政厅的名义，下发了《关于革命造反组织经费开支的规定》，对包括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及其他事业单位，城市街道、农村等各类造反组织所需的“公杂费”、“宣传费”开支，分别做出明确规定，实质是将各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各种开支合法化。其中的“宣传费”，就包括编印出刊小报的经费开支，让其有比较稳定而充足的来源。

中央的规定出台后，四川省立即以“四川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的名义（其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全省最高权力机构即为这个省革筹小组），于1967年11月24日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中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文件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八月十四日批转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提出以下试行意见”。并明确强调“以往规定如与此有出入的，以试行意见为准。”

这份《试行意见》第二条，其中就专门谈及小报问题，规定说：“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应当以收抵支，亏损国家不予弥补。”¹

这实际上就是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从办报经费这个源头上，切断小报的资金来源，让其成为无米之炊，难以为继。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至1967年底，四川省内仍在继续出刊的小报，不足一半。

大概是怕这个《试行意见》各地、市、县贯彻执行得不坚决彻底，1968年3月中旬，四川又以“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财办”的名义，下发了一个《关于印发“对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若干问题的解答提纲”的通知》。《通知》对各种文革经费开支，再次作了细致的规定及解释，其中关于包括小报在内的宣传费，再次强调说：“宣传费只能解决笔墨纸张和小宗印刷等。编印走资派罪行录之类的材料，应当象办小报一样，实行收费，自负盈亏。”²

当时还是属于四川省管辖的重庆地方当局（夺权后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革联会”），为控制舆论，打压和限制小报，早在1967年3月，就专门做出了一个关于小报的决定。“决定”称：“鉴于目前

¹ 以上《文件选编》第178页。

² 以上《文件选编》第183页。

重庆市各革命群众组织所主办的小报太多，已经给我市印刷工作和纸张供应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保证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为了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经我市革联会所属各革命群众组织讨论决定，从即日起各小报一律停办（除《山城红卫兵》外），并联合创办《山城战报》。”¹

1月夺权后在重庆建立的“革联会”，因为有重庆军方的强力介入和支持，在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出台以前，一直是代行重庆党政财文大权的地方权力机构。同时，又有当时四川“二月镇反”这个背景。因此，这个限制乃至取缔小报的“决定”一出台，各家小报纷纷关门停刊，连重庆最有名的最有势力的重大“8·15”的机关报《8·15战报》，也在3月中旬面临被迫停刊的命运。而按“革联会”的意思，整个重庆市只保留两家小报，一家是代表学生红卫兵的《山城红卫兵》，另一家即声称代表全市所有造反组织，却是由“革联会”自己主办新创的《山城战报》。可见，各地方当局（哪怕是“夺权”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对小报的限制和打压是一贯如此，由来已久的事。

北京既是首都，又是小报最多的省市之一，在中央高层授意下，在限制打压小报的泛滥方面，出台的措施更多，也更为坚决。在中央转发北京那份文件不久，1967年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与文革中职责和权力都很超常的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明确规定，所有外地来京人员，不得在北京的学校、机关设立自己的联络站，也不得在京编印出刊自己的小报，违者将追究。这份《公告》的出台，大大限制了外地小报在北京编印发行的生存空间。

对北京本地的小报，在经费，尤其是印报必不可少的纸张供应，印刷条件方面加强控制和管理，同时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对一度处于无序状态的小报予以限制打压。在这种收缩态势下，大多数规模较小，无多大背景和势力的造反组织小报，自然难以为继，不得不关门停刊，消失于无形。而对那些有影响、有背景，能利用各种手段办法生存下来的小报，则是采取加强管理控制，甚至对报纸内容和发稿，予以审查，并对其发行范围和发行量加以限制的种种办法，进行规范和打压。

¹ 《8·15战报》第13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编，1967年3月16日。

大概是1967年或1968年初，北京市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印件办公室”的机构，隶属于北京市革委会，专门负责对印刷品（主要是“文革小报”、传单、各类资料等），对一切印件的管理、审查等。这个机构有点类似文革以至文革后的地方新闻局或新闻办之类。

关于这个特殊机构的存在及运作情形，当年在北京及全国颇有名气的清华《井冈山》的一篇文章就有所披露。1968年6月28日，清华《井冈山》第150期第4版上，刊载一篇题为《本报为什么拖期——敬告本报革命读者》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章说：

最近，关心本报的革命读者纷纷来访，来信，来电话，询问第一四八期本报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刊。

这究竟是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第一四七期本报刊登了《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第一四八期本报拟发表《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续完），并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排好版。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北京市社会印件办公室突然提出要对本报进行新闻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可以出版。本报随即向市革委会有关机构表示，本报自创刊以来已出版一四七期（正刊），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社会印件办公室在我们继续发表保卫中央文革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时突然提出要进行审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十分尖锐激烈、错综复杂的时刻，在杨余傅黑后台即将揪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发生这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今年三月本报旗帜鲜明地点了王关戚反党阴谋集团的名。这时，印件办公室竟然无理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点名。并且蛮不讲理地威胁说：你们再这么点名，我们就不许你们出报！请同志们看一看，他们到底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究竟站在那一边？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我们敬爱的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历来十分重视红卫兵小报，高度评价了红卫兵小报在两条路线、

两个司令部斗争中作用。但是，印件办公室的某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阻挠红卫兵小报出版。他们除了对已经上级批准的红卫兵小报进行无理“审查”外，还从物质上施加压力。今年三月份以来，他们即停止对小报的卷筒纸的供应。最近，则更加直言不讳地对本报工作人员声称：“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越印越少，最后印一点在校里发发算了。”

文章披露的该“社会印件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那番话：“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越印越少，最后印一点在校里发发算了。”可以说，这正是代表了北京官方，对小报所采取的态度和对策。实际上，真正照此办理，曾经风光一时的小报，也就成文革前就有，而且现在也还在实行的不公开的内部资料性质的报刊了。发行和影响不超出校园的范围，而且自生自灭，听之任之。想当初，清华《井冈山》印数达数十万份，而且在全国一些主要大城市建有发行联络站，发行“航空版”，那是何等风光。如今沦落成仰人鼻息的“内部报刊”，“文革小报”走下坡路，衰退至如此，实在是大势所趋。

特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透露了该“社会印件办公室”工作人员，借手中权力管卡索要，搞“腐败”的情况：“社会印件办公室到底是个什么组织，那里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个组织，这些人一贯毫无道理地向来联系工作的单位索取体育表演、文艺演出票及各种报刊资料。你如果带来这些东西，他们便装模作样地翻一翻稿子，然后盖上‘此稿可用’四个大字，算是‘审查’完毕。在文化革命进行了两年的今天还保留着这种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工作作风，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

如果说，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红卫兵小报，此时面临有关当局的管、卡、压等措施的话，接下来，他们面临的却将是灭顶之灾。

4、毛泽东痛批“五大领袖”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1968年从5月开始，到7月底，清华大学发生了震动北京，并最终触怒中央高层的“百日大武斗”。正是这场持续3个来月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导致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清华大学虽然长期形成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的一统天下，但文革派性仍在清华园内有所表现，一些不同观点或不满意蒯大富大权独揽的人，逐渐结成一个对立派别“414派”。在中国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与掌权者对立的反对派，似乎总是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与支持，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其实，初期起事“造反”的造反派也是反对派）。由此，在清华校园内，与掌权者蒯大富等对立的“414派”，竟渐成气候，成了与蒯大富“井冈山派”不相上下的一股势力，挑战和威胁着蒯大富等人的“一统天下”。在筹建清华革委会时，蒯大富欲以其控制的“井冈山派”单独成立革委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高层，鉴于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红卫兵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示范意义，强调必须两派大联合后共同成立清华权力机构。蒯大富不愿与“414派”分享权力，乃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打垮对方，重新恢复“井冈山”的一统局面。这种造反派向对立派别武力征服获胜而单独掌权并成功的先例，文革中亦屡有发生。最典型最著名的，要算王洪文率“工总司”在上海，先是砸了耿金章的“二兵团”，后来又武力攻打“上柴联司”及“支联站”，造就他的一统天下。上海当局及中央，在此事后亦表示认可，王洪文反而更得赏识和高升。

蒯大富挑起清华“百日大武斗”，正是欲模仿王洪文，走武力征服之路。

1968年5月2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机电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第2天凌晨3时攻打“414”控制的东区浴室楼。5月30日凌晨3点，蒯大富亲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攻击信号。在蒯大富、鲍长康（文攻武卫总指挥）指挥下，“井冈山派”开始了对“414派”长达近百天的武斗内战。其间，双方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甚至爆破等，双方互有胜负及人员伤亡。

当年7月，在两派相持不下之际，蒯大富再次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高层会议，决定武力封锁“414派”的主要据点清华科学馆。蒯大富在会上下令，在封锁行动中，凡是对方有进出科学馆的人员，均可开枪。若因此打死了人，后果由“总部”承担。从7月4日开始，受命封锁科学馆的“井冈山”武斗队，连续发生开枪击人事件，仅7月中旬，共打死学生2人，另有1工人被打死，4名学生受重伤。¹

¹《井冈山》第150期，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1968年6月28日。

清华武斗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报到中央高层，甚至惊动了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有消息说，是被毛泽东任命为“联络员”，专门掌握搜集首都各高校动态情况的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后引起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些“学生领袖”的无法无天，遂向北京市革委会下令组织工宣队进驻北京各主要大学，从学生红卫兵手中接管文革大权。7月28日，按毛泽东指令迅速组织起来的，据说达数万之众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头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却遭到蒯大富所控制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学生武装的猛烈抵抗，伤亡惨重。

蒯大富等人大概预感到工宣队的进驻，将宣告他们在清华校园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而且，当时也不知派工宣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所以才敢不顾后果地下令武力抵抗。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工宣队员，连续遭到学生武装用长矛、铁棍，以至枪支、手榴弹的袭击。当天即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景况惨烈。消息自然很快报到毛泽东那里。

7月28日凌晨3时半，震怒之下的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五大领袖”，陪同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德等。毛泽东余怒未消，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批，二不斗，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

毛泽东不客气地给几位“学生领袖”下了最后通牒：“现在提出两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最后，毛泽东严厉地警告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

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¹

遭此打击，不仅是清华的蒯大富，就是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等及其所掌握的红卫兵组织，就此失去毛泽东和中央高层依托。

几天后，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举动，将外国客人送赠他的礼物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在中央安排下，媒体作了空前规模的宣传。8月15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工宣队代表，显示其对工宣队的肯定和支持。10天后，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第2天，《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系列举措，正式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表明毛泽东及中央高层，已经将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宠儿”红卫兵抛弃，他们不再是可以左右文革局势的重要力量。再以后，大专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初高中学生遣送下乡，曾经风行一世，似乎风光无限的“红卫兵小报”，绝大多数也就此划上句号。

5、为小报唱挽歌的各类“工人报”

在“文革小报”明显走衰落的大背景下，大致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则是1968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报名为《XX工人》或《XX工人报》的小报，笔者将其统称为“工人报”。这类“工人报”的出刊时间，有些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初期。无论从出刊时间，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以及已经比较规范的文风版式来看，这些“工人报”都属于“文革小报”的末班车。按笔者的说法，它的出现，实则是为“文革小报”唱最后的挽歌。

大致说来，这些“工人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创刊时间晚，一般都是在1968年下半年，甚至1969年才创刊；其二，其主办者不是什么“造反团”、“战斗团”、“总部”之类，而是省、市（地区）、县“工代会”；其三，这些“工人报”尽管还有一些“大批判”之类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强调正面宣传，已经带有几分“官报”性质，而与“小报”的特征越来越远。

¹ 《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神州激荡》第379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工人报”（或者类似报纸），真正是风行一时的“文革小报”的最后挽歌。它既延续继承了文革群众组织造反小报的某些特征，但似乎又试图往“官报”靠拢，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报”。而且，现实的情况也真正是，经历了“工人报”这个短暂的有些不伦不类的过渡期之后，“文革小报”也确实完全消亡了。

各类“工人报”的出现，是全国文革大局发展演变的结果使然。各地夺权并建立“革委会”后，中央和地方当局为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和引导，提出大联合的号召，并以首都北京为样板，相继建立了“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代会”、“农代会”等三大全市性的大联合体，分别将学生、工人、农民等群体及其造反组织置于其控制管理之下。其间，一些造反团队已被以这种大联合名义取消瓦解了。于是，从首都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各基层的地、市、县，除“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外，一批名为“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之类的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并逐渐成了官方当局支持和得以依靠其控制局势的基本力量，占据了社会主流位置。其后，甚至完全取代了当初的造反组织。

这类“工代会”建立以后，为舆论宣传需要（而且当局也乐于让其取代原先过于杂乱，且自行其是的各类小报），基本上都新创一份小报作为其机关报，这就是各类“工人报”出台的背景。北京的“工代会”成立较早，北京“工代会”成立以后，即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的名义，出刊一份小报《北京工人》。这份《北京工人》，虽然创刊于局势动荡混乱的1967年初夏，但其办刊倾向已有向正统官报靠拢的迹象，因之在众多的北京小报中，不算引人瞩目，影响也不大，绝对超不过北京城区范围。不过，有意思的是，该报1967年6月初出刊的第8期却在其2版刊发了一则消息。该消息称：

经中央文革批准可在全市公开发行的小报有下列十种：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红色工交》、地院《东方红（报）》、矿院《东方红》、《首都红卫兵》、《兵团战报》、《北京工人》。¹

¹ 《北京工人》第8期，北京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编，1967年6月9日。

《北京工人》刊发的这则消息，尚无可靠证据证明确有其事，但显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象《北京工人》这类比较正统的小报，是不敢“造谣”造到中央文革头上的。《北京工人》发这则消息，也是为显示其得到官方高层认可的特殊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当局早在1967年春夏之交，就有控制限制小报过分泛滥的势头。以当时北京来说，各类小报已达数百种之多。目前限制到仅10种小报能公开发行，可见控制限度之大。当然，由于局势动荡混乱，各种势力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小报泛滥势头真正控制下来，是1967年底到1968年间的事。

上海因为王洪文的原因，情况比较特殊，一直没有全市性的“工代会”，而由王洪文控制把持的“工总司”取而代之。因此，上海无《上海工人报》之类，而由“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代替其地位和作用。

由“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办的“工代会”小报，最初名为《革命职工报》，创刊于1968年，之后1969年才改为《天津工人》，署名“天津市工代会主办”。其他省市，如安徽省工代会主办的《安徽工人》，以及安徽合肥市工代会常设委员会办的《安徽工人》，浙江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主办的《杭州工人》，以及浙江金华地区工代会主办的《金华工人》，江苏镇江工代会主办的《镇江工人》，无锡市工代会主办的《无锡工人》，南京市工代会主办的《革命工人》，扬州市工代会与扬州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合办的《扬州工人》。河南省郑州地区工代会主办的《二七工人报》；辽宁旅大工代会主办的《旅大工人》；吉林省长春市工代会主办的《春城工人》，吉林省四平市工代会主办的《英雄城工人》；内蒙古呼和浩特工代会主办的《工人风雷》；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主办的《武汉工人》；湖南长沙市工代会主办的《工人战报》，湖南省工代会主办的《新湖南工人》以及后来由湖南省工代会与长沙市工代会合办的《湖南工人报》；陕西省西安地区工代会主办的《西安工人》；贵州省工代会主办的《贵州工人》等（此外，贵州还有一份由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的《贵州农民》）。

除此之外，有些地区和城市的工代会所办的这类工人小报，不用《XX工人》这种常见的方式，而是另用一种比较时髦，也比较有革命性的报名。如河南开封地区工代会的机关报，名为《无产者报》。这份《无产者报》寿命较长，一共出刊100多期，后来与开封地区农代会又合办的一份《新开封报》，才停刊结束其使命。此外，江苏镇江地区工代会（筹）办的小报，也取名《无产者》。其他，

如黑龙江大庆工代会的小报，取名《大庆风暴》，辽宁锦州市三代会（即工、农、红“三代会”）的小报名为《战火正红》（后又更名为《战报》），山西大同市工代会的小报名为《消息导报》，而山西平定县三代会的小报名为《看劲松》，湖北黄石工代会的小报名为《钢城战报》。笔者家乡四川省自贡工代会成立后，将原几个“司令部”合办的《盐都炮声》小报更名为《自贡工人造反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和地县当局的做法更干脆，如上文已经提及的那样，甚至不让当地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各自办自己的小报，而是由所谓“三代会”联合办一份报纸，或是已经有的也强行停办合并，办成一份小报，直接命名为《三代会报》之类。如福建省福州市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于1969年3月底创刊的《三代会报》，河南省“南阳地区三代会”主办的《南阳三代会》，以及开封地区工、农、红代会合办的《新开封报》，江苏扬州市工、贫、红三代会主办的《风展红旗》，江苏宜兴县三代会合办的《宜兴风暴》，江苏丹徒县工农红代会主办的《东风战报》，江苏丹阳县三代会筹委会主办的《新丹阳》，镇江工农红代会主办的《镇江工农红》。

四川的地、县（市）一级小报，后期被打压合并后，由这种“三代会”名义合办的情况，更为普遍。如四川内江市原来由内江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办有一份《沱江怒吼》的小报，内江市“三代会”建立后，即将《沱江怒吼》接管，改为“三代会”名义主办。万县市的情形也类似，原来由万县市赤旗战团与工人造反军合办有一份《江城战报》，万县市“三代会”成立，也将《江城战报》接管过来，由“万县市三代会合编”。富顺县情况更特别，小报《红旗》，原来由富顺二中红旗八·一〇革命造反队主办，富顺县“三代会”成立，即将这份由中学造反派办的小报改作“三代会”的机关报。四川其他由“三代会”合办的小报，还有隆昌县三代会办的《隆昌风雷》，永川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办的《永川红旗》，以及荣昌“两代一筹”（即其中有“一代”还处于“筹备组”阶段）主办的《荣昌战报》等。

总之，这类由所谓“三代会”合办的小报，类型大致也如各类“工人报”，属于那种末代挽歌性质的小报。这种小报一旦被停刊、终刊后，也就正式宣告了“文革小报”的终结。

6、上海《工人造反报》终于停刊——“文革小报”的绝唱

如果说，各类“工人报”可以称为“文革小报”终结前之最后挽歌的话，那么，上海“工总司”所办的《工人造反报》的停刊，就算得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之绝唱。

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称：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各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推动全市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完成斗、批、改各项任务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读者反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市委也深感报刊过多，不易管好。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为了安抚当时势力还很大的“工总司”各级头头和人数众多的造反队员，《决定》还带点解释性地说：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全市的各级党组织都应该关心、支持和监督报刊的工作。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停办《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加强对报刊宣传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这样做，报刊数量少了，要求更高了，不是减轻了全党办报的责任，而是加重了责任。各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加强对报刊通讯员的领导，积极向报刊提供工作情况，提供稿件，提出对报刊的批评和建议，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对《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的原订户，应该鼓励他们订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可改订《文汇报》、《解放日

报》或退款。希望各级党组织协助邮政局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

既然中共上海市委已经正式出台了《决定》（估计事前已与“工总司”头头谈妥或正式通报过），《工人造反报》不得不奉命行事，终于在上海市委宣布的期限内（4月中旬），于4月15日的第445期，在头版左下方刊载了一份题为《坚决拥护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的“终刊公告”，全文如下：

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
《工人造反报》到本期止终刊。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也曾经指出：“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

市委的决定，是加强党对新闻报道的集中领导，进一步做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需要，是斗、批、大革命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要集中力量办好党的报纸，充分发挥报纸的革命舆论阵地作用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是十分必要的。

《工人造反报》从创刊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多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有力量，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就有方向。

从这四年多来的宣传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广大革命工人，各条战线的通讯员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我们希望广大革命工人和本报的通讯员、读者，在坚决贯彻市委的决定的过程中，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阅读党中央的机关报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积极支持党的报刊工作，为进一步办好党的报刊，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共同努力。也希望本报的原订户踊跃地改订中央报刊或改订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

或者退款。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的决定推动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和兄弟报刊同志的努力，上海的报纸定将办得更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工人造反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¹

不过，据说“工总司”一帮头头同意《工人造反报》正式终刊，也是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个压力既有来自顶头上司上海市委，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甚至包括中央高层）。因为，此时放眼一望，偌大一个中国，能以“造反报”的名义公开出刊并广为征订发行，而且公然打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这样刺眼的造反组织来主办的报纸，也仅此一家。上海虽有王洪文以特殊地位宠着护着，但对其他省市的造反组织，却是一个强刺激，也是心目中以资比较对照的一个样板。那些外省市造反派头头，经常拿上海“工总司”及《工人造反报》说事，给地方当局对自己的打压限制寻找不满的借口。甚至向中央上告。由此，弄得一些省市地方当局很头痛，经常向上海市委查询以至交涉，让上海市委深感被动。而且，好像中央高层也在过问此事，如此，上海市委不得不狠下决心，亮出此招，将《工人造反报》停刊。事前，自然免不了先给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头头通了气，做了一番工作。而且，为了对外界表明此举不是专门针对《工人造反报》一家的，还特意捎上一份官方刊物《支部生活》陪宰，让其与《工人造反报》一并停刊，让“工总司”一帮大小头头及造反队员，多少寻得一点心理平衡。

如此，从1966年下半年起势，到1967年文革高潮中风起云涌，大放异彩的“文革小报”，历经1968年的退潮，1969年的没落，直到1970年代初的以“工人报”等名义进行的最后挣扎，终于在1971年4月以《工人造反报》的终刊而划上句号，宣告其历史终结。

¹ 均见《工人造反报》第445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1971年4月15日。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五）

向 前

第二章 夺权后的分裂和混乱（1967.1—1967.8）

第三节 为“湘江风雷”翻案

1 翻案力量的集结

“高司”排挤他人独自掌权导致自身越来越孤立。要求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力量不断汇集起来，静待时机准备反击。“湘江风雷”成员众多，虽然支队长以上的负责人被捕，其他成员仍在活动。军队的抓捕只能震慑一时，其他成员很快就聚集起来开展翻案活动。此外，被军队抓捕的“湘江风雷”成员数量太多，中央发布抓捕指示以后并没有进一步行动。所以，除了部分核心成员一直被羁押，其他成员都陆续开释。“湘江风雷”成员及其支持者一边赴京告状，一边联络发动上街刷标语、发传单，不断与“高司”等发生冲突。

为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中学生红卫兵酝酿建立统一的组织加强力量以便与“高司”抗衡。3月9日，由“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¹、“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的汤建平²、长沙市一中“齐卫东”、“夺军权”战斗队的黄杏英等人发起，部分中学生在省展览馆举行会议，决定分头联络长沙市中学、中等专科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中会”）。会议决定要全力以赴地为“湘江风雷”翻案，还印发了一份针对当前形势的16开铅印的大字报，试图打开局面。3月12日，“红中会”发起人再次碰头研究成立后的工作，就红中会的机构设置、各学校的红中会组织名称的确定做出了决议。会议决定将成立时间定为1967年3月9日，推举申学松为主要负责

¹ “井冈山红卫兵”的负责人谢若冰是成立“红中会”最积极的发起人之一，曾多次出面穿针引线。但“红中会”正式成立时，她推翻了之前达成的共识，不愿放弃“井冈山红卫兵”的独立地位，要与“红中会”并存。虽然如此，双方仍保持了良好关系并有多次联合行动。

² 胡宜民领导“造反有理军”支持“高司”以后，汤建平等脱离组织，自行成立“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参与为湘江风雷平反活动。

人，设立红中会总勤务站，下设政治部（负责人申学松）、组织部（负责人李昆明）、宣传部（负责人汤建平）；以红中会的名义，向社会各界发表宣言说“湘江风雷”组织不是反动组织，创办《长沙红卫兵报》作为宣传工具。¹3月18日，“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整合了全市20多所中等学校的造反派中学生，大张旗鼓地为“湘江风雷”翻案。²支持翻案的群众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等口号。高司针锋相对地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

4月7日，“红中会”组织了150多人，与“井冈山红卫兵”等一道，将听命于省军区的《湖南日报》社封闭，宣布《湖南日报》和“高司”、“省红联”在报社印发的报纸均不得出版。4月10日，“高司”突袭“井冈山红卫兵”占据的报社，武斗中双方受伤50多人，“高司”进占报社。³随即赶来的造反派很快又将“高司”人员赶走，派一批学生和工人长期驻守。通过对《湖南日报》社的占领，造反派向省军区和“高司”摆出高调的挑战姿态。

第二次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在全市乃至全省都造成了较大影响，这一事件标志着“井冈山红卫兵”和“红中会”的一大胜利，也是高司走下坡路的开始。此后，“红中会”派出人员下厂串联，长沙大小工厂乃至岳阳、衡阳、株洲、湘潭的工矿企业里，都有“红中会”成员的身影。⁴“红中会”贴出大字报《高司向何处去？》发出声讨，又将长沙市的大街小巷贴满“誓为湘江风雷翻案”、“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还我‘湘江风雷’”、“红中会永远和湘江风雷战斗在一起”等标语，顿时轰动长沙。⁵

4月上旬，从“高司”中出走的大学生成立了“高校风雷挺进纵队”（简称“高校风雷”），名称套用了“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以示坚决为“湘江风雷”翻案。工人造反派与“高司”的斗争原本处于各自为战、分散抵抗的状态，再封《湖南日报》让他们感觉到联合的重要，于是筹划建立统一组织。4月中旬，以几个大工厂的造反组织为基础，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人造反组织——

¹ 李昆明．长沙红中会始末[A]．见：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长沙文史(第18辑)[M]．长沙：(内部出版)，2005：151-153．

²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未刊稿)

³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2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40-441．

⁴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未刊稿)

⁵ 李昆明．长沙红中会始末[A]．见：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长沙文史(第18辑)[M]．长沙：(内部出版)，2005：154．

“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各厂矿的工人不少是“工联”成员，其他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属“湘江风雷”的工人组织也成建制加入“工联”。“工联”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实力最雄厚的工人造反组织。¹

要求翻案的活动之所以声势浩大，与当时全国的形势变化有关。“反击二月逆流”愈演愈烈，谭震林、陈毅等受到批评，青海“2·23”事件被重新定性。²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给要求翻案的人们极大鼓舞。命令要求支左部队“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³《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是造反派组织的好消息，它取消了省军区为群众组织定性的权力，还要求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人员。

4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干部做思想工作，江青在会上讲话号召“解放军要立新功”。⁴省军区和各地军分区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付造反派，只是仍然坚持不为“湘江风雷”平反的底线，更加大力扶植“高司”和“省红联”的其他组织来与之对抗。原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等人对省军区的作法提出了异议。4月22日，章伯森领衔“亮相”，声明支持“工联”，支持4月7日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章伯森是原省委候补书记，他的“亮相”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转变态度。4月25日，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各地、市、县区机关也成立了“永向东”组织。5月12日，章伯森等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声明支持“工联”，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湖南如果有‘二月逆流’，根子就在省军区。”⁵与章伯森相反，华国锋贴出大字报，表示不同意湖南在二三月间有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章伯森、华国锋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引起了很多争论，大批普通干部需要逐一站队，加剧了人群的分裂。

¹ 陈益南．青春无痕[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135-136．

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1967年3月24日。见《文革文库》。

³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1967年4月6日。见《文革文库》。

⁴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见《文革文库》。

⁵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90．

造反派不失时机地发起攻势,五一广场一带连日举行群众机会游行,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口号。¹5月1日,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在河东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形势好转令支持“湘江风雷”的群众欢欣鼓舞,其他城市的造反派积极跟进形成呼应。5月8日,湘潭锰矿两派群众为争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影片发生冲突,沈桂华组织“东升司令部”200多人到军分区静坐绝食。²绝食很快发展到长沙,“红中会”、“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等学生红卫兵率先绝食给省军区施加压力。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单位的“工联”组织人员声援绝食学生。14日,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设立“绝食指挥部”领导在军区门前的绝食活动,更多的人到省军区门前游行、贴抗议书和刷标语。绝食期间,省军区门口人山人海,无法正常办公。中央文革多次来电,要求章伯森等工作,劝说停止绝食。

省军区派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等,与“红中会”汤建平等举行谈判。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部分协议。当日傍晚,省军区向绝食斗争指挥部转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来电,内容大致是:革命小将们,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指挥部宣告绝食结束,紧接着在市内举行游行庆祝胜利。³

2 局势的扭转

虽然造反派的活动声势浩大,局势的扭转则需要中央的指示。省军区之所以愿意派人谈判,很大程度是因为知晓了中央的态度。5月12日,湖南省军区给广州军区写了情况汇报,承认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错误,决定“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对于在押人犯,“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报告还表示原支持和依靠的“红联”,“已不适应夺权需要,决定动员他们解散,对其中的各个组织,分别对待,是左派就支持。”⁴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1.

² 湘潭市志(第1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236.

³ 李昆明. 长沙红中会始末[A]. 见: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长沙文史(第18辑) [M]. 长沙: (内部出版), 2005: 155.

⁴ 《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1967年5月12日。见《文革文库》。

这一报告经广州军区上报中央，毛泽东批示说：“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¹然后，报告与批语一道转发各地。既然中央态度已经比较明白，省军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策略。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湘江风雷”倾斜。6月初，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支持翻案的群众组织和“高司”等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详见下一小节）。

未来的“三结合”权力架构中，军队代表由中央决定，群众组织无疑是“湘江风雷”和“工联”等，只有革命干部人选尚不确定。原省委领导中，张平化在北京接受审查，王延春因“8·19事件”被打倒。几位书记中，万达已表态支持“高司”，其他的没有明确表态。章伯森率先“亮相”表态支持“工联”，但他只是候补书记，做革命干部代表的第一把手分量不够。所以，他建议“工联”去争取华国锋的支持。“工联”5月初已经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汽车电器厂软禁起来，以供随时批判。“工联”的负责人胡勇等曾经多次出面找软禁中的华国锋谈话，希望他能够像章伯森一样出来“亮相”支持“工联”。但华国锋口头表示应该支持造反派，却始终不肯明确表示支持哪个具体的造反派组织。

6月19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让华国锋到北京汇报工作。胡勇回长沙向华国锋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华国锋听了传达，当即表态支持“工联”，并写了“亮相”大字报《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主要有四点：第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第二，高司、红联、公检法²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第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支持；第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³6月21日，华国锋和胡勇同机进京。一个是革命老干部，省委书记之一；一个是数十万工人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两人捐弃前嫌联袂进京，前景一片光明。

¹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1967年5月14日。见《文革文库》。

² 此处“公检法”即“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公、检、法机构的工作人员。

³ 《华国锋在湖南长沙发表的声明》，1967年5月20日。此处《文革光盘》所写的时间有误，根据各方面材料综合，时间应为6月21日。

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动组织，实际上已为其平反，只是不准恢复组织。7月5日，湖南各群众组织谈判代表赴京举行谈判，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湘江风雷”。10日，总理批评省军区领导说：“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随后，叶卫东被释放，进京参加谈判。7月12日的湖南问题辩论会上，周总理关心“湘江风雷”，一再询问叶卫东的情况。叶卫东汇报后，周总理笑着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会议最后决定制止武斗，省军区检查错误。¹

7月20日，湖北武汉发生了“7·20事件”，群众组织间冲突达到顶峰。27日，中央军委撤销了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百万雄师”解散，“工总”获得平反，被认定为“革命群众组织”。²“7·20事件”的处理结果为“湘江风雷”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利机会。27日，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周恩来总理说“湘江风雷是造反派组织，左派，应该恢复组织，恢复名誉”，认为“高司”是受蒙蔽的，提出要改组湖南省军区。³中央军委给驻湖南的野战军部队第四十七军电报指示，决定由四十七军领导湖南文化大革命。消息传回，湘江风雷在长沙及省内其他城市连日举行武装示威游行。7月31日，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向中央作了全面检查。⁴

3 大武斗

1967年夏天，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处于混乱状态。这些地区夺权迟迟没有得到中央认可，对立的群众组织矛盾愈来愈深，形成了两大派或三大派组织。除湖南外，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宁夏等地的形势尤为严重。这些

¹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1967年7月12日。见《文革文库》。

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967年7月27日。见《文革文库》。

³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的讲话》，1967年7月27日。见《文革文库》。

⁴ 《龙书金的检讨》，1967年7月31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地区的保守派势力比较强大，而且大多得到了驻地解放军的支持。¹大规模的武斗轮番上演，毛泽东所预期的“全国全面内战”，已经成为了现实。

6月3日，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来组织。²4日，湘江风雷举行重新树旗大会，宣布公开活动。³在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支持下，湘江风雷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公开的有组织的活动，并自行恢复了总部。如此一来，与“高司”的冲突渐趋白热化。从4月中旬开始，“工联”和“湘江风雷”已经陆续将“高司”设在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查抄占领。⁴到5月底，“高司”人员大多退回了河西，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广播站，馆内有持“高司”成员200余人。6月初，“工联”派头头决定要拔掉中苏友好馆“高司”广播站这颗钉子，30多个组织配合行动。

6月4日，“工联”下属组织“六号门”人员手持钢钎、棍棒打头阵，数百人围攻中苏友好馆。“高司”从河西开来的增援队伍被“工联”派堵在湘江岸边，寸步难进。晚10时，“工联”派武斗人员以自制的燃烧瓶攻击，还在中苏友好馆正门纵火，顿时烟火熊熊俨然成为硝烟浓烈的战场。5日，30多个组织召开“攻打中苏友好馆会议”准备全面进攻。“高司”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红色怒火”敢死队，并以大队人马作掩护。当晚，“红色怒火”50多人的敢死队，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黑衣，手执木棍，在300多人的掩护下，乘夜色冒着密集的石块冲进了被围困的大楼。深夜12点后，“工联”派再度进攻，防守馆内的“高司”人员试图突围遭到堵截，只好退守。6日，“红色怒火”敢死队掩护学生突围，第一批150人从馆内冲出，被围堵追打，死2人，伤29人。中午12点以后，其余人陆续突围，又被打死5人，伤33人。下午4时，“工联”、“湘江风雷”派占领了中苏友好馆。

武斗中，共打死10人，计“高司”派7人，“工联”、“湘江风雷”2人，无辜学生1人；伤200余人。砸毁省军区大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拆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人民币。⁵这是省内自“文

¹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 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526

²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1.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91.

⁴ 长沙市区被湘江分隔成东西两片，大学校园多在河西，故河西是高司的大本营。

⁵ 武斗过程根据长沙市“处遗”材料、“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以及叶长青、

化大革命”以来第一起动用枪支造成死亡的武斗惨案。此后，武斗频频发生，双方对抗更加严重。¹6月间，两派群众先后在市文化局、建湘陶瓷厂、湖南大学、矿冶研究院、湖南农学院等地发生较大规模武斗。²

6月24日，中央以正式文件通知湖南（还有浙江、江西、广西等省市）在京辩论的两派代表，要他们达成协议并保证执行。³然而，这样的协议并没有人执行，省内各地武斗仍在持续进行中，造成人员伤亡，交通阻塞，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⁴7月3日，中央正式通知湖南各派群众组织、地方干部和支左军队派代表赴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的谈判，⁵希望解决问题，结束混乱局面。7月5日，各群众组织代表离长赴京。谈判期间，武斗达到高潮。7月，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在长沙管道厂、长沙肠衣厂、长沙机床厂等处发生武斗，双方各有伤亡。7日，南郊豹子岭的大规模武斗死亡13人，重伤75人。18日，长沙纺织厂发生的武斗中死亡2人，伤10余人。长沙火车北站的武斗导致京广铁路长沙段铁路运输被迫中断。⁶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湖南医学院发生武斗，死亡1人，伤多人。25日，省军区武器室和市郊马坡岭武器弹药库被抢。⁷

7月27日，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时明确表示要为湘江风雷平反。“高司”派群众及中间群众闻讯后立即向湘潭大撤退，有家属的教职工和干部则举家迁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教授或五六岁的孩子都是徒步，当时称为“7·27大逃亡”。⁸“高司”以湘潭为大本营积蓄力量伺机再起，双方武斗的主战场从

陈益南相关文章和访谈材料综合整理而成。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1-442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1-442

³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团来京谈判需达成六条协议的通知》，1967年6月24日。该通知要求：“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见《文革文库》。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91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91-792

⁶ 7月1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湖南两派代表时主要谈铁路运输问题，建议铁路军管，两派都退出，并派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前往长沙。20日，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和双方群众代表共9人，立即回长沙解决铁路被堵问题。上午7时黎原和双方群众代表共9人飞抵长沙，下午4时，黎原召开各群众组织代表协商会议，解决铁路运行中断问题。下午6时京广铁路长沙段恢复通车。《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湖南两派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7月19日；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2.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2.

¹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598.

城内转向城外。8、9月间，长沙和湘潭交界的地方仍炮火连天，武斗达到另一个高潮（详见下一节）。

1967年夏秋的大武斗之所以如此激烈，与高层领导“武装左派”的思路有直接关系。“7·20事件”前后，毛泽东知道一些部队支持所谓“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认为应该武装左派。7月18日，毛向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武装工人和学生？”，“我看应该武装他们！”¹江青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时说：“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²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支持右派，因此主要问题就是要武装左派。³此后各地继续发生大规模夺枪事件，在广东，甚至连劳改集中营的囚犯也开始夺枪。⁴

4 其他地区的翻案活动

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活动不仅在长沙进行，其他地方的“湘江风雷”成员及其支持者也在行动。

衡阳。1967年2月开始，衡阳的“全野”⁵、“衡阳工总”⁶等就在积极活动准备为“湘江风雷”翻案。衡阳市饮食行业的一些基层单位之前成立了隶属“湘江风雷”的小组织。很多成员在2月5日被拘捕，被释放后成立“二五战团”，⁷以示不忘受挫的这一天和继续造反的决心。他们发动罢市，饮食、旅社、照相、

¹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14.

²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1967年7月21日。见《文革文库》。

³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576

⁴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14.

⁵ 1966年11月间，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以“首都三司驻衡联络站”名义到衡阳住进地委招待所。不久，全国各地16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110多人陆续到衡阳。他们以联络站为主，组成“全国赴衡革命造反野战军”（简称“全野”）。

⁶ “衡革会”成立以后，一批群众组织宣布撤销。“衡阳造反有理军”总部宣布撤销，拥护“衡革会”。其成员李国炳表示反对，率一部分人另行组建“衡阳工总”。李国炳和易桂清分别任正副司令，黄朝宏任政委，支持“湘江风雷”翻案。“衡革会”情况在上一小节有详细叙述。

⁷ “二五战团”常委有邹高炳等12人，下设15个支队。

印染、理发等行业一度关门停业。¹4月9日，衡阳的17个造反组织成立“湘江风雷平反委员会”，散发传单，举行街头演讲辩论，派人到北京上访，递交材料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等处。“首都红代会赴湘调查团”在长沙、衡阳、株洲、湘潭等地调查，把调查材料送中央文革小组。²

郑开诚等人成立“衡阳湘江风雷总部”公开活动。7月，他们会通“红铁军”、“衡阳工总”等发动上千人冲击“衡革会”、“工代会”。27日，李国炳以“衡阳工总”司令名义组织游行，喊出“湘江风雷有功无罪”、“打倒衡老赵”等口号，冲击了衡阳“支左办”。³28日，郑开诚等再次发动上千人查封《衡阳日报》。8月4日，衡阳“湘江风雷”、“红铁军”等组织占据“衡革会”办公大楼，“衡革会”就此瘫痪。⁴

常德。2月的时候，“高司”的同盟军“红联”配合“支左”部队逮捕“湘江风雷”负责人。4月，常德“工联”建立，形成“工联”和“红联”对立的两大派。“工联”提出要“清算常德军分区‘常老谭’在二月逆流中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与军分区矛盾加深，和“红联”发生冲突。5月，常德地区的“湘江风雷”重新出来活动。7月4日，因“红联”派在武斗中抓捕了“工联”派成员，“工联”派组织人员向“红联”要人，冲突造成300人受伤。随后，两派组织开始抢夺武器弹药。“红联”在常德军分区“明抢暗送”中，获得大批精良武器，装备和火力均占优势，其对手“工联”也抢得大批武器。17、18日，两派组织数百人持枪进行攻防战，各死1人。26日，两派武斗致使常德市各医院伤者壅塞，常德师范学校3名学生被打死。

“工联”和“湘江风雷”在常德市区、津市及澧县、石门等县城占优势，“红联”派在慈利、汉寿、桃源县等县及农村占优势。因此，常德、津市等地的“工联”和“湘江风雷”武斗队伍还不断出征支持本派组织。8月中下旬，应汉寿县

¹ 应山红．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未刊稿）：52．

² 应山红．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未刊稿）：42-43．

³ 应山红．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未刊稿）：61．冲击支左办，原因在于支左的部队明确表态支持“衡革会”。3月5日，支左的6900部队群众来访接待站答《衡阳日报》记者问，曾经表示衡革会是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反动组织“红保军”、“红旗军”、“湘江风雷”不准翻案。次日，《衡阳日报》发表《目前衡阳地区文革的几个问题》向公众传达了这个消息。“衡革会”持“高司”派观点。长沙“六·六武斗”发生以后，由“衡革会”组织举行了有驻军参加的机会游行声援“高司”，声讨长沙“工联”等组织。

⁴ 应山红．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未刊稿）：43

“湘江风雷”之邀，常德市同派武斗队伍两次出动打汉寿，双方共死伤数十人。8月22日，临澧县“红联”派调动数千农民和部分民兵，围攻占据县城的“工联”和“湘江风雷”以及津市“文攻武卫小分队”。9月17日，“工联”联合临澧、津市、常德、澧县等数县武斗队伍，攻打被“红联”夺取的临澧县城。双方投入数千人，携带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迫击炮等现代化武器。仅在大木岗遭遇战中，津市“文攻武卫小分队”即被打死13人。8、9月的武斗中，常德地区武斗死亡人数超过300人，伤者数千。¹

第四节 “湘江风雷”彻底平反

1 《八·十决定》

按照中央决定，8月1日，第四十七军进驻长沙主持全省的文化大革命。²8月2日，周恩来、戚本禹等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否定了“二·四指示”。³当他听汇报说“高司”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指示”时说：“我们还承认了错误，你们还捍卫什么？”⁴另外，周总理还指出湘潭“7·25”⁵夺权是公开对抗中央，并严厉批评湘潭军分区负责人。会议决定通知空军司令部和四十七军飞机散发“6·6通令”⁶和“7·13通知”⁷等文件。

8月6日，省军区作了《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检查，⁸对前段时间的支左工作进行检讨。检讨书总结了三个错误：第一，“把湘江风雷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被取缔摧垮，抓了大批的人”；第二，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和其他革命造反派；第三，支持保守组织，在支左中站错了队，“红联”大方向是错误的；最后，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收回“二·四指示”，给“湘江风雷”平反。⁹7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

¹ 资料来源：常德地区“揭批查”运动材料。

²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2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43.

³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指示》1967年8月2日。见《文革文库》。

⁴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指示》1967年8月2日。见《文革文库》。

⁵ 湘潭“7·25”夺权指支持“高司”的“革造联”在省军区和湘潭军分区支持下夺权。

⁶ “6·6通令”指的是1967年6月6日发出的《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长沙武斗事件的急电》。

⁷ “7·13通知”指的是1967年7月1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⁸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92.

⁹ 《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1967年8月6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三方代表，除批评群众抢枪外，严厉批评了省军区 and 军分区。周恩来总理说：“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军区要继续检查”。¹

在北京参加谈判的高司负责人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了书面检查，承认了配合军区镇压“湘江风雷”、“肃流毒”和与“工联”争斗的错误。²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简称《八·十决定》）发出，“二·四指示”被推翻，湘江风雷重获新生。《决定》说：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

¹ 《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7日。见《文革文库》。

² 《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1967年8月8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¹

此后一段时间的《湖南日报》上，多次出现军队支持“工联”和“湘江风雷”的表态文章。“广大指战员一致表示：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和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左派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²“六九五五部队某部决心为人民立新功，誓与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左派紧紧团结在一起，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³湘江风雷、工联与高司的争斗已见分晓，大局初定。

9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正式成立，黎原任组长，华国锋、章伯森任副组长，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⁴“省革筹”第一号公告宣布：“自即日起，湖南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统归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⁵“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发出联合通告，要求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⁶但是这些参加造反的知青仍然滞留城市，“联合通告”的效力并不大。“高司”负责人虽已作检讨，其组织成员却继续抵制《决定》。“高司”总部撤退到湘潭，其支持者长沙县“联总”

¹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1967年8月10日。见《文革文库》。

² 《省会驻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林副主席最新号召》[N]。湖南日报，1967，8(12)。

³ 《六九五五部队某部决心为人民立新功》[N]。湖南日报，1967，8(13)。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93。

⁵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公告》，《湖南日报》，1967年9月17日。

⁶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94。

也转入湘潭，更大规模的武斗正在酝酿中。

2 新一轮武斗高潮

进入8月，湘潭市成为“高司”派的大本营。“高司”的支持者——湘潭“革造联”赶走了“工联”观点的“红造联”，控制了湘潭市区。¹5月起，“革造联”相继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经省军区批准，7月25日，“革造联”夺权，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湘潭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但是，由于中央对湖南问题的表态，几天以后，夺权被宣布无效。²7月底，中央对湘潭军分区严厉批评，³但湘潭方面置若罔闻。即便是《八·十决定》下来，“高司”派群众依然不肯执行。在长沙等地失利的“高司”人员陆续到湘潭与“革造联”会合。⁴湘潭是伟大领袖的家乡，长沙的造反派当然不能容忍高司占据湘潭，他们打出“解放湘潭”的口号，筹划进军湘潭。“高司”和“革造联”决定在湘潭县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布防，使得易家湾一带成为炮火最为密集的地方。

“工联”和“湘江风雷”等策划了向湘潭联合进军的行动，出动队伍对“高司”防线攻击。“高司”和“革造联”调兵遣将全力防守。双方人几乎天天都有激烈的枪炮大战。人们使用了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炸药包、火箭筒、火焰喷射器、高射机枪、高射炮、六0炮、迫击炮及野战炮等。面对“高司”和“革造联”的坚固工事，“工联”和“湘江风雷”派出最具战斗力的“青年近卫军”和“长沙青年”，还调动了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红旗军”。“青年近卫军”

¹ 5月31日，“革造联”成立工代会，“红造联”进行抵制，发生了武斗。6月1日，“革造联”抄了“红造联”60多个基层组织。7月，“革造联”和“红造联”先后在锅炉厂、湘潭饭店发生近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之后，“革造联”占了绝对优势，“红造联”只好避走到长沙、株洲等地。湘潭市志(第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236-237。

² 湘潭市志(第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237-238。

³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周恩来总理批评湘潭“7·25”夺权是公开对抗中央，并严厉批评湘潭军分区负责人。《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2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周恩来总理说：“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7日。见《文革文库》。

⁴ 7月27日，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时已经表态要为湘江风雷平反，湖南大学高司派群众及中间群众闻讯后立即向湘潭大撤退，时称“7·27大逃亡”。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湖南大学校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98。

成员几千人荷枪实弹，装备齐全，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并且接受过军队院校学员的军事训练，成为武斗的重要力量。8月初，联合进军湘潭的行动中，“长沙青年”、“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和“红旗军”共近十辆卡车在易家湾与来自湘潭的“八一兵团”和“红色怒火”等发生遭遇战。“革造联”出动坦克至易家湾，抵挡长沙方面进攻。¹

此时的局势十分微妙——省军区和湘潭军分区支持“高司”和“革造联”；四十七军支持“工联”和“湘江风雷”。易家湾武斗惊动了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四十七军立即派人对武斗双方做工作。与“高司”继续争斗的同时，“工联”和“湘江风雷”发生摩擦在长沙大打出手（详见下一章第一节）。²由于忙于内战，“工联”和“湘江风雷”分别与“高司”、“革造联”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武斗并未就此停息，易家湾的武斗一直持续到9月20日才彻底结束。从8月初到9月底，易家湾一带武斗大战40天，双方投入的武斗队伍和后勤支援人员近万人。双方共计死92人，受伤上百人。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大量建筑物被毁，造成巨大的财产和物资损失。³

易家湾武斗的同时，另外一场大武斗也在进行。“工联”和“湘江风雷”的摩擦给“高司”打回长沙带来希望。“高司”原“河西抗暴指挥部”负责人，在“革造联”的支持下，筹建“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准备以坪塘为跳板“解放河西（湘江西岸的长沙市区）”。“工联”和“湘江风雷”内讧的“火烧湘绣大楼”事件发生后，“高司”正式提出了“打回长沙去”的口号。8月22日，“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在湘潭锰矿招待所召开会议，研究“解放河西”的行动计划，决定将“指挥部”往河西推移，首先占领坪塘控制长宁公路，然后进军湘江西岸的长沙市区。8月26日，“自卫抗暴指挥部”200多武装人员分别进驻坪塘、九江庙、含浦和长沙市二十四中。

面对“高司”卷土重来的严峻形势，“工联”与“湘江风雷”暂停内讧共同对外。握手言和的“工联”与“湘江风雷”筹划了“解放坪塘，消灭高司”的行动。8月底，坪塘地区武斗趋于激烈。9月4日上午，双方在莲花桥发生遭遇战，

¹ 湘潭市志(第1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237-238.

² 1967年8月20-22日,“工联”和“湘江风雷”在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被称为“解放路武斗”事件,又称“8·21大武斗”和“火烧湘绣大楼”事件。详见下一章。

³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陈益南.青春无痕[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从而揭开了“九五坪塘大武斗”的序幕。工联和湘江风雷按预定方案，兵分三路进攻坪塘，对高司进行包围。按照计划，西线的主要任务是阻击“高司”来自湘潭的增援，堵截坪塘“高司”向湘潭方向撤退，配合中线、南线向二十四中靠拢，保证中线聚歼“高司”派于二十四中学；南线任务是从水路进攻观音港，登陆后先在该港设立战壕和工事阻击，然后从南面配合中线向二十四中进攻；中线主攻方向为二十四中，也是作战的核心，双方均派出主力在此争夺。“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在二十四中投入500余人，以步枪、轻重机枪武器为主，动用平射炮等重型武器防御。进攻方在该处投入近千人向防守阵地和工事猛攻。武斗从5日凌晨5时开始，当晚7时左右结束。因双方动用的武器均为现代化装备，战斗中均以步炮兵协同作战形式，武斗人员全力以赴，故双方伤亡很大。

参加“九五坪塘大武斗”的有294个单位，人数共计3900多，其中“工联”和“湘江风雷”派出3655人，“高司”派参战者为299人，死亡80人，经济损失计粮食15000斤，人民币10.98万元。这是继易家湾武斗后，规模最大、双方投入人员最多、武器装备最齐全的一次武斗。¹

经过多次武斗，“高司”丧失了更多地区，支持“高司”的“红联”派处境也极为艰难，于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发动农民进城。²《八·十决定》下发后，“红联”联合基层专政力量，对农村的五类分子大肆迫害，其中包括发生在零陵地区的“道县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农村基层干部和“红联”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大开杀戒，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1590个大队，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死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零陵地区其余县市及邻近其他专区受到影响。³

¹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湘潭市志(第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²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点名批评湖南等省的恶劣武斗和“以农村保卫城市”的错误口号。通知说：“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1967年7月13日。见《文革文库》。

³ 1967年8月，得到县武装部支持的道县“红联”在与造反派“革联”武斗中失利。部分农村地区传言有“四类分子”相互串联参加了“湘江风雷”，还准备领枪回来。此时，道县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期间，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所谓的

3 知青造反的“继续革命”

两大派群众组织激烈争斗的同时，知青返城风再度刮起，知青造反掀起了新一轮高潮。长沙、衡阳、郴州等地安置部门反映，70%的下乡青年不肯回乡，长期逗留城市要吃住，要户口，要安排工作。长沙知青组织以“反迫害”、“反歧视”等名目出现，较大组织有“红一线”、“反迫害”、“山鹰战团”、“红农会”、“斗批改”和“长沙市中学毕业生红旗联络站”（简称“中毕红旗”）。¹

“反迫害总勤务站”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负责人许九皋是浏阳县中岳公社赵湾大队知青，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在充斥着“黑七类”的知青中，这算是很优秀的家庭出身了，也因此被举为“司令”的。²使“反迫害”声名鹊起的是该组织成员张扬针对“永向东”³的传单《造户口反无理》而写的一篇批驳文章。争论的焦点是“造户口反”的问题。知青“倒流”回到城市以后，很多人继续年初没有完成的事情——强行上城市户口。《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力图制止知青“造户口反”，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⁴“永向东”紧跟形势，满街张贴《造户口反无理》的传单。9月，张扬写了七、八千字的文章《评〈造户口反无理〉》为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辩护。该文章从知青受迫害的角度出发，提出迫害知青的恶人都在城市里，他们有权回来造反云云。文章论证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可以理解。文章铅印8000份，散发张贴到长沙的大街小巷，造成很大影响。⁵

10月，张扬写了一篇3.6万字的大文章，题为《控诉罪恶的新型农奴制度——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旨在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⁶文章拿到“反迫害总勤务站”“常委会”上讨论，部分“常委”提出，“农奴制度”放在标题过于刺

反革命纲领，即“8月大组织，9月大暴动，10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8月中旬开始，道县各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动员部署杀人。8月到10月，道县农村到处可以看到“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M]。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600-601。

¹ 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

² 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

³ “永向东”即“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详见本章第三节第一小节。

⁴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N]。人民日报，1967，7(9)。

⁵ 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

⁶ 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A]。见：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M]。长沙：（内部出版），2003：294。

眼,“新型”、“罪恶”的形容词过于激烈,口气应该和缓一点,要“壕堑战”保护自己。于是,文章标题改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在“机关报”《反迫害》上刊登,署名为“反迫害总勤务站”两个“下属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动态分析室”。该期报纸印刷了几千份,除了分发,便是派人满街叫卖,群众踊跃购买。¹部分知青将该报带到广州街头叫卖,少量报纸流入香港。该文章否定“上山下乡”制度,把原因归到刘少奇的身上。多年以后,张扬坦言“文革”中因为要打倒刘少奇,所以揣着各种心思和目的的人们便都把自己讨厌的人和事,把自己想打倒和否定的东西算作“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种“策略”,一种“保护色”,与对刘少奇、对“文革”、对所谓“两个司令部”真实的看法和感情毫无关系。²

“红一线造反团”是以江永桃川农场万正凡为负责人的一个知青组织。万正凡曾参与“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的诸多活动。“红一线”不仅拥有武装,建立了“红一线”文艺宣传队到处表演,还不定期出版《红一线报》。

“道县事件”之后,临近的江华、江永两县受到波及。8月17日,江永县知青王百明被打死。19日,部分长沙知青乘车返城,途径零陵县城汽车站时遭枪炮伏击,何小明等9名知青死亡。³消息传来,知青们悲愤异常。知青组织联合成立治丧委员会,各组织头头担任委员,其中有“红一线”的万正凡、“反迫害”的万力、“山鹰战团”的陈立主、“斗批改”的黄萍根等。“红一线”宣传队编排节目《怀抱战友》、《血的控诉》等在街头、剧院演出,举着血衣控诉和呐喊,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⁴

曾经从事知青生存状况调查的知青参与组建了以黄萍根为首的“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斗批改调查团”,总部设在省委招待所。⁵还有知青以“长沙市红农会广阔天地红卫兵通讯社”的名义创办小报《农奴戟》。该报一篇文章针对提出了16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时,使用一套

¹ 张扬. 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 (未刊稿)

² 这段话是张扬多年以后说出来的,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在他文革期间写文章时的心态——究竟是为了自我保护张冠李戴还是真的认为“上山下乡”应由刘少奇负责。

³ 彭稚鳌. 血溅东风镇[A]. 见: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M]. 长沙: (内部出版), 2003: 232.

⁴ 危大苏. 血红的理想之旗——“红一线”知青回忆实录[A]. 见: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M]. 长沙: (内部出版), 2003: 183.

⁵ 庄生蝶. 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 (未刊稿)

高压和欺骗的手段？下乡青年合乎参军条件的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在动员中规定任务？并可以顶替？名额上则是多多益善，知识青年像旧社会去充军还是像到农村去干革命？”¹

11月，“红中会”杨曦光与刘锦长²在长沙共同主持了一次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³杨曦光写就《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夺军权一兵”署名张贴长沙街头。⁴该文公开为知青打抱不平：“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⁵文章反对中央和“省革筹”要求知青回乡的指示，认为知青群体“受压迫”最深，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⁶外地知青代表发言表示欢迎湖南战友去“传经送宝”，于是便有了赴外地传授经验小组的产生。“斗批改”的黄萍根和“红农会”的孙天南、高长国等组成了赴广东的小组。他们在广州召开座谈会，协助广州知青办报纸，还赴增城等广州知青下放点考察。⁷

¹ 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A]．见：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M]．长沙：(内部出版)，2003：293

² 刘锦长，山东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1967年秋来到长沙，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

³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未刊稿)

⁴ 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A]．见：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M]．长沙：(内部出版)，2003：294．

⁵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1967年11月16日。见《文革文库》。

⁶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1967年11月16日。见《文革文库》。

⁷ 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

【评论】

清华“二校门”的变迁

唐少杰

清华“二校门”既是清华大学著名的历史建筑之一，也是北京知名的历史文物之一。它始建于1909年底，是清王朝政府在得知美国国会于上一年5月通过决议，退换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培养留美预科学生后，与美方达成协议，双方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所用的校门。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开学之际，正式启用，门额上刻有晚清军机大臣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擘窠大字。这个校门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清华的正式校门，名为“大宫门”，后来由于清华地盘的不断扩大，不同的校门先后出现，这个最早的清华校门就被约定俗成地称为“二校门”。



1949年之前的清华“二校门”

然而，在文革爆发不久，清华“二校门”就成为了文革最初摧毁的文物。事由如下：进入1966年8月下旬，清华的文革形势愈益明显，即文革最初两个月在“工作组”支持下的、由若干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学生势力已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以这些学生为主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在8月20日正式成立不久，为了转变“工作组”撤走之后他们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



(左图：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二校门”被拉倒之前，先有“清华大学红卫兵”一人，登梯挥锤，敲毁晚清军机大臣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图中的门柱和门框所系住的钢索清晰可见。)为了压制或战胜已与他们日趋对峙的“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更主要的是，一方面为了巩固或扩大他们在清华文革已有的主动权以及话语权，另一方面为了制止或改变已经非常明确而又不断恶化的他们自己父亲的境况，他们于8月24日下午发起并

实施了著名的“八·二四联合行动”。他们调集、指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等十二个中学的红卫兵学生，进驻并封锁了清华大礼堂至“二校门”一带地区。在广播喇叭持续不断



地播送诸如“通知”、“告示”、“通牒”之际，这十二所中学的成百上千的红卫兵召开誓师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发表讲话并布置任务，强调“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些中学红卫兵学生与“清华大学红卫兵”一起，看守大字报区，拍摄那些这几天在清华园日益增多的批判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上图：清华“二校门”被拉倒的瞬间，围观的群众鼓掌），随后撕毁了这些大字报。正是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氛围下，“八·二四联合行动”于下午5时许（一说六时许）达到了高潮，即清华“二校门”作为文革“破四旧”指涉的所谓封建文物被拉倒。¹

¹ 参见邱心伟、原育蜀主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43-48页，香港，香

整个拉倒的过程大致如下：先由一名“清华大学红卫兵”学生踩着梯子用大锤逐一敲毁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稍后，启动清华大学汽车系用于教学的东方红牌履带拖拉机，由北向南拉动已套住门柱、门框的“二校门”上的钢索，瞬间就拉倒了这个屹立于清华园五十六年之久的“二校门”。

今天看来，拉倒“二校门”，完全是预谋、有计划的，因为有事实为证，当时在场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工作人员用摄影机记录下来相关的情景。那时，某个单位（或部门或机构）能够请到摄影记者来现场真实记录某一活动，可见这种活动非同小可。十分有意思的是，前几年香港凤凰电视台在播放《校长蒋南翔》以及清华百年校庆的有关节目时，就播映出了当年记录下来的“二校门”瞬间倒塌的活生生的镜头。

（右图：清华“二校门”被拉倒的瞬间）

8月24日夜间，“清华大学红卫兵”抓来了数十位主要是原清华大学中层（部、处、系）干部，在对这些干部实施抄家、辱骂、殴打、关押的前前后后，还对他们进行处罚劳动，即让他们清理“二校门”拉倒后的现场，把拉倒的“二校门”的砖石搬运到东面数百米远的河沟旁。在随后连续两天的处罚劳



动中，一些红卫兵学生围在上述干部搬运石块所经过的路途中，不时地对这些干部侮辱、打骂，还故意不许其中的部分干部头戴草帽遮阳、穿戴鞋袜，从而加大对干部们的处罚。从清华历史的角度来看，拉倒“二校门”，既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一大耻辱或罪过，也是整个文革运动施虐（上图：清华“二校门”被推倒后，一些被打倒的清华干部被“处罚”，在现场进行清理“二校门”石块的劳动，四周是围观的群众。）清华园的一大标记，

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

更是清华大学全面进入文革的一大象征！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二校门”的毁掉难道就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们乃至他们那些担任中共党和国家相关领导职权的爹妈们所视为如此的文革之初的“应有之举”吗？换言之，用文革刚结束时形容“四人帮”势力挣扎、反扑的一句话来形容：“二校门”的毁掉可谓“清华大学红卫兵”“灭亡前的疯狂一跳”！

清华“二校门”原址自1966年8月24日之后“空白”了半年多，1967年3月25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决定在这一原址处建立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这个塑像由高达4·8米的永久性钢筋混凝土塑像和3·3米高的晚霞色大理石的基座所组成，整个塑像高达8·1米，象征着解放军建军纪念日。林彪题写的那著名的“四个伟大”手迹镌刻在基座正中一块长1·2米、宽0·9米的汉白玉上。3-4月，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美术教师主持了这座毛泽东塑像的设计、施工。经过清华校内外多方人士的大力协作和共同努力，仅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成普通时期需要半年左右才能完成的毛泽东塑像的翻模、浇注、养护和拆模等工作。5月4日上午9点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在清华主楼前举行“庆祝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大会”，该兵团总部负责人、校内外施工人员代表、外校文革群众组织代表和一位外国人士等在



矗立在清华园的毛主席巨型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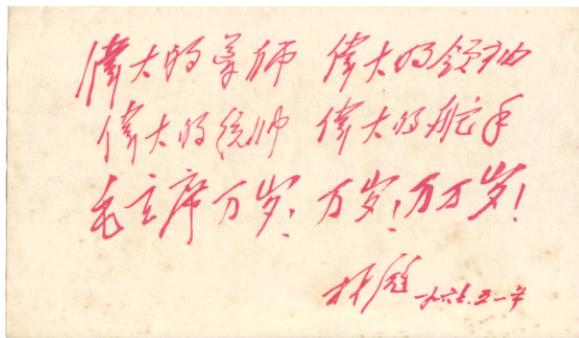
（上图：1967年5月初，印制在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发行的有关报刊上的、建立于清华“二校门”原址的毛泽东巨型塑像的照片。）大会上发了言。10点半，在新落成的毛泽东塑像周围，举行了庆祝落成的群众游行活动。¹

必须提及的是，林彪专门为清华大学毛泽东塑像的建立所题写的“四个伟大”。林彪这“四个伟大”题词的手迹自在清华出现之后，风靡整个中国大陆，不过在文革时期的一些地方或场合，有时把“伟大的领袖”提到了“伟大的导师”之前。林彪的这个题词是蒯大富在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活

¹ 参见“红代会清华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41、42期合刊，1967年5月6日。

动时，当面向叶群提出请求林彪为清华刚刚建成的毛泽东塑像题词，叶群一口答应蒯大富，表示愿意代向林彪转告。¹

据悉，林彪原想在其题词署名下方写下为清华大学所题之类的字样，由于他先前给某个单位的有关题字遭到了该单位文革两派群众的争夺以致发生武斗，林彪遂决定不再在其题字中写出相关的接收单位名字。此事有待进一步考证。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镌刻林彪“四个伟大”题词手



迹的汉白玉被消除。

（左图：林彪为清华大学毛泽东塑像题写的、在文革时期广为流行、套红发表的“四个伟大”手迹。）在清华“二校门”原址出现的这个塑像完全可以称之为文革时期风靡中国大陆

的难以计数的毛泽东高大塑像的始作俑者，它自1967年5月4日正式揭幕起，一直矗立到1987年8月29日。这个塑像在其所经历二十年的周围环境远不如今天的同一处，环境那样整洁、优雅。当时，这个塑像前的那条马路还不像今天这样由沥青筑成，这个塑像南面的那座小桥也不同今天这样是由仿汉白玉石块和水泥建成，而是一座很简陋的小桥。这个塑像所面对的那条水沟（即排水渠）还不是今天这样由砖石砌成的河道，而是一条小河似的地沟。这个塑像坐落在这里显得很协调、很不雅观，我自己就数次见过毛泽东塑像头上有鸟或鸽子站在上面以及雨雪天气时给这个塑像套上特制的大雨衣的情景。

文革结束后十多年，清华“二校门”原址的这座毛泽东塑像受到了诸多清华校友的批评。最主要的是，时过境迁，人去物非，清华大学校方决定拆除这座毛泽东塑像。在拆除之际，清华校方发布了一个关于此事的文件：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的1966年8月24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清华的“红卫兵”组织拆除了作为清华象征的“二校门”，后在该处树立起一座高大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塑像正面的底座上，曾镌刻着林彪专门为此塑

¹《唐少杰对蒯大富的访谈》，2010年1月19日，深圳，未刊稿。

像落成题写的“四个伟大”的题词。这座塑像首开先例，在全国引发了共建毛主席塑像的风潮，在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下才得以制止。二十年后，在清华广大教职工和海内外校友的要求下，学校决定拆除这做毛主席的全身塑像，在原址重建清华二校门，同时学校郑重决定，在主楼大厅北墙上建立永久性的毛泽东青铜浮雕头像，以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对清华大学的关怀。¹



（右图：1987年8月—2011年底贴挂在清华大学主楼大厅正面墙壁上的毛泽东青铜浮雕像。）在拆除之前的几天里，清华校方向其所属的下级单位和教职工传达有关决定拆除毛泽东塑像的文件。我依然记得在我参加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前身）大会上，有关负责人刚讲解完这一文件，一、两位讲授中共党史的教师情绪愤然，大声斥责。

在正式拆除毛泽东塑像之前的三天，即“1987年8月26日 在主楼大厅举行毛泽东青铜浮雕像揭幕典礼，高景德（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注）在典礼上讲话，150多人参加。毛泽东圆形青铜浮雕像直径2米，贴挂在主楼大厅正面的墙壁上，以代替目前已局部损害破损的位于二校门的旧塑像。”²

清华“二校门”原址的毛泽东塑像于1987年8月29日深夜拆除之时，我到了现场。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塑像处在用化纤编织袋围起来的脚手架之中，几个工人用大锤、电锯不断地敲打、切割。为了维持秩序，清华园派出所的民警也出现在现场。

自1987年8月29日之后，清华“二校门”原址又“空白”了近四年的时间。1991年4月，清华校庆八十周年前夕，清华海内外校友捐助200余万元人民币，清华“二校门”得以重建。这离清华原有“二校门”的毁掉相隔了约二十五年，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失去了自己最悠久而又最富有意义的校门！

¹ 转自黄延复、贾金悦：《清华园风物志》第11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

² 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下册，第81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重建于1991年4月的清华“二校门”。

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清华主楼那个毛泽东头像的经历。前面引用的清华大学校方文件所说的“在主楼大厅北墙上建立永久性的毛泽东青铜浮雕头像”，事实是还不到十五年，就悄然无声地被摘下而再也没有出现。直接原因是2002年初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要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那年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一行来清华，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清华校友胡锦涛在清华主楼接待厅欢迎来宾。之后，布什在清华主楼大厅发表演讲。他所演讲的地处北面墙壁正是原来的毛泽东头像所在之处，这时已改为了一直到今天都高悬在上的清华校徽和清华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八个大字。据我所知，毛泽东头像被取下乃至以后没有再挂上的原因，清华校方没有做过任何公开说明或解释。



（左图：今天的清华大学主楼正厅墙面景色，原毛泽东头像安放处改为悬挂清华校徽。）近些年来，每到暑期，每日进入清华园、驻足“二校门”周围的各地游客，川流不息，络绎不绝。经常是高达数万余名的游客从早到晚在“二校

门”四周观赏、留影。有的导游在向游客们介绍“二校门”的经历时，竟然把当年毁坏“二校门”一事说成了是蒯大富及其“清华造反派”一伙所为。路过他们身旁的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望着那些大多数是年轻学生模样的游客，我心里一再发颤：年轻人啊，你们可否从清华“二校门”的变迁，体验或理解清华大学文革那风雨如晦的岁月？

【往事】

按：本文是王复加先生撰写的家族传记，记载了其祖父王缙绪（抗日名将、国民政府四川省代主席），其父王泽濬（抗日名将、“国民党战犯”）和他本人（三联书店编辑、右派）一家三代的百年沧桑。

原文四万六千多字，编者节选了王缙绪在反右派运动之后蒙冤始末及王复加请求为其昭雪的申诉。下面是王缙绪、王泽濬、王复加三人的简历。

王缙绪（1885—1960年），四川西充县人，1906年入四川省陆军弁目学堂；辛亥革命后，历任营长、团长，后调任刘湘部旅长。1926年川军接受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第5师师长，1929年改任第2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1931年创办西南地区著名的巴蜀学校，1938年任第29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并任四川省主席。在此期间，整顿吏治、查办贪污、裁减冗员，政绩卓著。1940年率29集团军参加枣宜会战，以55岁之身，亲冒矢石，身先士卒，督战负伤，歼敌5000余人，打破了日军的西进计划。1941年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日英雄”称号，领陆军上将衔。1943年10月率部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3月被委任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被任命为西南第一路游击军总司令。1950年初，王自行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之职，将部队和武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所属的部队收编。中共建国后，任川西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在四川省文史馆工作。

王泽濬（1903—1974年），王缙绪的长子，抗日名将。青年投军，从其父统辖部队的连长做起，后升至旅长。1931年赴峨嵋中央军官训练团学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请缨抗日。1938年武汉会战中，以国民党第44军少将副军长兼149师师长之职亲自督战；1944年常衡会战中，指挥三个师歼敌3000余人。1948年11月其部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王受伤被擒，关押于抚顺战犯劳改所，1974年病逝。

王复加（1923年—），王缙绪的长孙，王泽濬之长子。1944年加入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青年委员会”，1946年任民盟总部直属成都荣立印刷厂会计主任，同年7月加入民盟；1950年任三联书店北京总管理处编辑部助理编辑，1951年任人民出版社编辑。

一家三代 百年沉冤 ——王复加家族回忆录（节选）

王复加

一、1949年后我家的情况

1949年1月，我父亲陆军中将军长王泽濬(jūn 四声)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俘。消息传来，祖母十分伤心。不久，正在天津北洋工学院读书的三弟，被华北野战军带到宿县与父亲见面，请父亲给祖父王缙(zūn 三声)绪写信，劝其起义。我祖父是国民政府的陆军上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父亲把写好的交给三弟，三弟随同策反干部到香港，将信交给姑父熊觉梦，熊再派他公司的一位高管偕同策反干部回到成都。

祖父见到父亲的信除了放心之外，竟想将策反干部扣为人质交金河街二弟看管，声言“还我儿子再还你干部”。我获知这一情况，立刻到文庙后街找祖父晓以利害。

那时祖父已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路游击总司令，正在开箱发放美式枪械。我对他说：“北平已和平解放。傅作义尚且知道替自己留退路，难道您还不为您被俘的儿子和我们孙辈着想吗？”然后我向他坦白，我早已是民盟主要成员……。劝说他发动起义，并说：“以您的身份完全可以加入民革，听听民革人士的意见也是好的……。”经我这番劝解，他没有将人扣下。日后也参加了民革组织。

1949年12月14日，四川还没解放，祖父王缙绪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并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24日，他以“治总”总司令名义致函解放军，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事后祖父在成都召开了各界团体会议，他亲自出面正式宣布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队进入成都。1950年祖父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并把所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祖父的军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同年，祖父还将在中国西南著名的、由他亲手创办的重庆巴蜀学校和西充巴蜀分校捐献给国家。当时邓小平还为此发表过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祖父王缙绪被任命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诸多职务。但是祖父不太愿意做重要工作，有时不参加安排的学习和工作，令进城的首长很不高兴。但他对文物方面的事却很热心，他与刘子华、杨啸谷、王国源、芮敬誉、陈宜庭等省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一道去川西人民博物馆工作，参加了建馆初期的文物鉴定和馆藏文物清理

工作。据馆中老人回忆说：“王缙绪将军曾给馆里的年轻人讲文物常识课，他看到库房里保存的字画被虫蚀、霉滥时，感到非常心痛”。



1951年10月10日，祖父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分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祖父看到身边故旧、好友台盟谢雪红、民盟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王缙绪将军）起义将领龙云等人先后划为“右派”，深感震惊，无奈之下他决定出走香港。途中经深圳边防，被扣押至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随身携带物品有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在被关押的3年里，政府既未对其提审定罪，也没判刑。事发后只有《四川日报》发表过“反革命分子”王缙绪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就再没有任何媒体作过后续报导，而其携带的所谓“罪证”也未公诸于众，这显然是因为祖父王缙绪出走的动机不构成犯罪，有关方面便采取了这种办法。王缙绪从此身陷囹圄，1960年，在入狱三年后，王缙绪绝食，瘐死狱中。

青年即投身辛亥革命，积极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在抗日战场上，以55岁之躯，迎枪林，冒弹雨，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于一次战役就消灭5000余日寇的祖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中共的监狱里。直到几十年后，后人们才知道祖父被抓、被关，是当局为配合反右派运动，事先设计好的阴谋。

二、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之后

解放后，民盟组织宣布重新审查旧盟员，每人都得交一份自传。《华晚》的复刊准备也基本完成，正式向新组建的盟市委（张志和、范朴斋已到北京当上政务院参事）备了案。1950年4月，得盟市委李嘉仲指示，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民盟中央只办一个《光明日报》，各地方省市不允许再办机关报，《华晚》复刊的希望破灭了。蜀加印刷厂没有再经营的必要，我也财力不支，决定停办。工友中有人建议我去找市总工会的陈沛森处理劳资问题。陈是原荣利印刷厂的工人（地下党员），我早就认识。他得知我愿将全部器材献给新政权，便报请军管会批准并入其市府印刷厂，并发给全体工人遣散费。

6月间盟籍审查完毕，我和仲恢请盟组织分配工作，李嘉仲要我们去上華大。我们认为華大是改造旧政府的接收人员，把我们当这种人看待自己很不服气，只接受他暂时安排的推销胜利折实公债的工作。

不久孟恢从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来信，说他已从上海《时代》杂志社转到三联书店编辑部任外文组组长，他也是解放前辛志超介绍入盟的。既是盟内同志，以前也一道学过俄文，希望我立即去帮助他处理书稿。于是我和仲恢请盟组织开了路条，于6月12日动身北上。市府印刷厂留用的几名工友知道我们要走，自愿把他们所领的遣散费捐给我们作路费，仲恢也兑换了他唯一的金戒指凑数。我们搭乘的是一辆破旧的货车，本身只能慢速行驶，加上川陕公路沿途有解放军追剿政治土匪（反动派顽抗势力），只能清剿一段尾随一段，这样到宝鸡竟走了十四天。

在郑州过黄河铁桥时，全桥尚未完全修复，车行到木架支撑处嘎吱作响，四十多分钟才过完。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已是6月29日下午，在客栈宿了一夜。第二天同到总布胡同：我到西总布胡同找到孟恢，见了邵公文，让我从助理编辑干起；仲恢在东总布胡同出版总署见了倪子明，安排他在人民出版社。

进了三联书店，我的助编工资定为每月七八十万元。此外，午餐和晚餐都免费供应丰盛的筵席，大家宛如与家人闲叙一般。我开始从事图书编辑，但搞的都是俄文汉译书稿。好在三联出书的种类未受限制，囊括了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

上自学术著作，下至儿童读物，做起来倒不觉十分枯燥。

9月间我迁到干面胡同宿舍，不久曾紫霞找我。向我谈起她获释后，一时恢复不了党组织关系，便到西康协助民盟在荣经地区搞地下武装。现被保送到人民大学学习，将来回四川工作。在此期间，我带她去过民盟中央见范朴斋叙旧，又去过政协礼堂见巴蜀学校校长周勋成先生，还去过《大公报》办事处见周太玄夫子。没想到他们早就认识了，曾紫霞与报社同志讲述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经历，大家对她肃然起敬（那时小说《红岩》尚未问世，否则知道她就是孙明霞的原型人物，会更加钦佩）。

1951年三联书店的编辑部及出版部分别并入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则并入新华书店。1952年10月，陈惠君带着我的一儿两女来到北京，我们移住东四后拐棒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不久她找到国家文物局的王冶秋（她的老师），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

但是，陈惠君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前程不会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伤害。1955年6月我与陈离婚，并选择了第二次婚姻，与朝阳大学毕业的郑秀琳结婚。她当时任教师工作。

三、1957年反右

1957年，我已是编辑八级，每月工资一百多元；当年又评我为第三编辑室先进工作者；而且搞了五年业余翻译也未加干涉，反而让社里出版我三个译本。4月开始“整风”。6月整风转“反右”，我参加了对美共归国党员谢和庚的批判斗争，对谢决不低头的勇气很感佩服。随后传来五教授（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挨批的消息，得知他们仅仅共同对科研体制提了五项具体意见，便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我感到震惊，连反谢的批斗大会也不想再参加了。

让我担心是，社党委曾通知我到监狱去见被俘的父亲，我随母亲去见了一面。父亲王泽濬被俘后曾因祖父王纘绪起义而获假释，任南京军事学院讲师，现在又被押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相见时我们感到形势不好，彼此担心。因受监视，只能述些家事。我告诉他大妹去了巴西，二妹身在台湾。此时父亲便问

起金河街（他建的公馆）楠木树长多高了，母亲不忍心告诉他，因土改退押已将住宅变成空军幼儿园了，只好谎称有海碗粗，这倒令他有些许安慰。

反右浪潮依然，我也有所警惕。父亲的遭遇是我心中抹不去的阴影，为了排解犹愁我拼命地工作。

1957年年底，祖父出逃偷越国境被俘的消息传来，虽然当时人民出版社对此没有做出反应，我还是更加不安了。

不出我的担心，1958年3月，上级开始对我批判，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撤销原有职务，工资由编辑八级降为行政二十二级，流放北大荒劳动改造。”

四、廿一年的劳改生涯

这时郑秀琳已经给我生了一女，且又怀有身孕。临行前我给她三百元作临产营养补助，每月再寄十五元由她抚养女儿。然后我把母亲送到苇子坑航空工业学校三弟家，前面三个子女我只好交给前妻陈惠君，托人民出版社社财务代支给陈每月四十元为抚养费。

我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三年，搞过基建（包括初期的干打垒），干过农活，上山伐木烧炭（我曾窒息窑中）打过马草，大跃进的冬季挖排水沟改造沼泽地，曾经连续21个小时刨冻土，一天只睡三小时，四顿棒子面粥、窝窝头送到工地，围着火堆烤着吃，吃成黑嘴黑手再用雪擦擦，结果擦成个花乌脸。

1961年我带着儿子被流放到四川巴中县巴中中学。

1964年，郑秀琳受我牵连，带着两个幼女也被发配到四川，被分配到曾口区中学任教师。我的母亲也被送回成都二弟家，1965年冬母亲死于肺心病，让我万分伤痛，值得庆幸的是，她老人家躲过了文革浩劫。那年恰逢汶川森工局来巴中招工，我十六岁已辍学的儿子做了林工，工作后也是倍受歧视。

文革伊始，我被认定为死老虎。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让我回校参加集体学习时，发现有人已撬开了我的房门，抄走我的译著样本、俄文书籍、鸭绒被等。1970年初“清队”结束，县教育局通知我下放茶坝区中学任教。

这时我的两个女儿认定是右派家属，被迫改母姓（以示背叛家庭），不能升学。两个女儿小学毕业后只好离开父母回到他们的原籍北京，一直谎称父母“双亡”，以借读形式完成了学业。这个期间我能够想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受了多少磨难。

后来，我奉命到茶坝中学报到，校长杨宗俊不要右派分子。第二天教育局给我正式调函再去茶坝，杨校长只好将我收下，命我按作息时间打钟，割猪草、煮猪食，喂养猪和种小半亩菜园；必要时还到镇上为学生厨房背米、油，用板车拉猪肉。有时我在拉米的路上（空着背篋或板车）高歌传统戏，学生反映我不思已过，后来改唱样板戏就无人再挑剔了。在我受罪时想到自己曾经是刘光同志座上客，如今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可我当年还利用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反美军暴行和反美扶日等游行示威。现在反觉得自己荒唐。这使我认识到乐观旷达才符合养生之道，相信自己终有可为之日，（王复加先生）坚持活了下来。



不久妻子郑秀琳来到茶坝，给我一份离婚协议，要我签字。理由是：我没有摘掉帽的可能，离了婚她就不再是右派家属。为了不再拖累她和两个女儿，我签了字，到镇上领了离婚证。但我仍担负每月十五元的子女生活费。

我和前妻的长女 1963 年在北京高中毕业，被分配到房山县永定河林场当果农；二女 1964 年在北京初中毕业，支边到山西曲沃，成为全国最早的知青。

1977 年我摘帽教英语。这期间我同刚分配来校的英语老师王代喜合编了一册《英语简明教材》，获得达县专区的好评和推荐。

右派改正以后，我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担任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编审。由于文革期间积压译稿甚多，但粗制滥造，就连稍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也有潦草塞责之作。于是我担负起选题、组织翻译、审读译稿、文字加工、校对清样的一系列工作。这样一来，接触到的外文语种有：德文版、塞文版、意大利版、匈牙利版、挪威文版。这些译稿我都是借助英、俄文工具书（主要是辞典）

来解决审读中发现的译文问题。我负责编辑完成书稿有二十一种，共计二十六册，约六百二十四万字，平均每年发稿一百万字以上。

1983年我被评为副编审，于是提出三十年来从未调过工资，错划右派反而降薪大半，请予考虑给我调薪，于是升了一级为编辑七级。1987年11月我获准离休，工资再提一级（享受司局级待遇）。离休之年已经六十五岁。

五、为祖父冤案奔走呼号

我离休后，为了祖父王纘绪的遗案，回到成都了解情况，从老一辈人口中得知祖父事发前的细节与原委。

祖父临去香港时，曾正式向四川博物馆提出去香港看病，博物馆向上汇报后，批准了祖父的申请。但是，当局为了配合反右派运动，决定借祖父去香港一事，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当局提前在深圳布控，待祖父出现即实施抓捕。

为此，我于1989年在蓉结识同一支部的盟员钱文华老人（祖父旧部属）进一步证实了此事。后来又听三叔二女儿转述重庆市公安局刑警队廖正彬回忆称：“1957年底他曾接受跟踪王纘绪，并实施逮捕的任务”。更加证实祖父负案确是事先有预谋的。经查1957年12月29日《四川日报》登出标题为：“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反革命分子王纘绪被我军捕获；王犯纘绪现已押回四川，正由公安部门审讯中”的消息。其中说“我边防军当场从王犯所携带的皮箱夹层中，查出王犯亲笔书写的反革命宣言，反动诗词等共三十本，约五十二万多字，还查出有关国际局势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剪报五十一份和美金四百元等许多罪证。”自此消息后，再无后续报道。从这篇消息中可看出，这是接受上级指示，做出先声夺人的“有罪推定”，未审先判就将我祖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1960年，我祖父殁死狱中，当局仅将死讯通知我大妹，至于遗体如何处理、遗物作何交代，是否定案或结案都未说明。尽管此案疑点重重，但是在当时毫无法制可言的环境下，子孙后代都自身难保，焉敢过问此事？

迨至1985年7月，受株连的诸叔得到人身解放，他们给邓小平写过申请信，请求为王纘绪平反并补发起义证。但是，他们得到的仅是四川省公安厅这样的复函——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复查和调查，王缙绪于1957年11月携带本人书写的反革命材料，越境外逃，被边防军逮捕，尚未判刑，王便病死于狱中。因此，报经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批示同意，对王缙绪本人不存在平反、纠正问题，也不存在发起义证的问题。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

上述答复隐瞒了我祖父赴港治病事先得到博物馆领导的批准的关键情节，将我祖父原本合法的出境，诬陷为“越境外逃”。其“子女亲友不受影响”一语，更是信口雌黄：何止子女一代，连我父、我辈、我的下一代都遭了灾，殃及三代啊！为了给我祖父讨回清白，我们再一次努力，给省司法厅两位领导亲笔去信，但对方置之不理。

2005年，我又致函胡锦涛主席，提出如下三项质疑和申请：第一，祖父当年去香港看病，不是外逃，如果外逃，早就和蒋同去台湾，何必发动起义？即使说查出“许多罪证”，那么为何在公安厅看守所延期羁押达两年多始终“尚未判刑”，以致“病死”，也没定罪，这分明是缺少定罪的依据，构不成犯罪。作为王缙绪的后代提出要对本案做出结论，恢复公民死后应享的名誉，并承认其通电起义的历史事实，补发起义证。第二，请尊重其子孙的知情权，将他死于何时、何地、何种病因，以及死后如何处理等情况书面告知，并尽可能发还骨灰或指明处置地点。第三，案发后在成都光华街家中抄没的所有财物，连同其被视为罪证的“反运（动）诗词”等随身携带之物，请准予作为遗物认领；尤以后者为其手迹，是否性质反动，有公开研判的必要，也令人心服口服。但胡主席未复我信，却由公安部于2005年5月31日复信称：“你所反映的要求平反问题不属公安机关管辖”。

但1986年四川省公安厅给我的答复是“经公安部批示”，何况原拟定的是“背叛祖国”罪名，岂非公安部管辖范围？这种推卸责任只能徒显无赖而已。

事后我向省公安厅递了申请书和详尽的申诉状，同样音信渺然；给曾省权厅长去过五封挂号信，甚至把请求降至最低，只要求在统战系统内部恢复名誉，也均不予应答。

2006年曾有许多仍在关注历史人物王缙绪的友人建议我查阅当年办案、现

已超期解密的档案。我到省监狱管理局未能查到，助查人员告我未经判刑者档案仍在看守所。我去看守所则推委于文化大革命，在动乱中该所受到冲击，档案未能保全。以上种种无理的搪塞与应付，彻底丢失了政府的公信。

六、父亲王泽濬的狱中往事

我父亲王泽濬再次被收监，是因祖父之事，两次特赦均未获释。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粗暴对待，加以囚膳趋劣导致死亡。多年来台湾国防部曾与在台湾的二妹多次了解其父情况。因二妹顾及大陆亲戚们的处境，忍受了几十年不曾与亲戚联系，始终回复不了台湾国防部所询问的问题。为此二妹在1983年和1994年往返二次为其父死因寻求真相，并向大陆公安部门监狱领取父亲王泽濬死亡证明，交付台国防部备案。二妹于1994年再度回蓉，为其父向四川省公证处申办死亡公证书。公证处对死亡地址只肯写明“抚顺”，不肯加“战犯管理所”五字。后来我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向省台办反映，得到台办副主任雷新乾支持，同到省公证处领到11月17日（94）蜀公证字4570号公证书一式二份，其证词写明“兹证明王泽濬（男，于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四日生）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因患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死亡”。

二妹返台后立即将其所执一份交到海基会。但到12月初，省公证处管理处却通知我，我递交的公证书被退回，理由是原证词中“战犯管理所”五字，“太带政治色彩了”。省公证处要我另制无此五字的同日期、同编号的公证书迳寄台湾海基会，同时要求对方退回二妹亲手递交的原公证书。

2000年3月我再次找到雷新乾，申诉两条理由：一、抚顺战犯管理所早已在我国书刊和影视等出版物中介绍和反映，国际上已广为人知，谈不上国家机密；二、战犯病死狱中，已写明“经抢救无效”，表明人道主义精神，又何必再有顾虑。雷新乾认我申诉有理，便为我给省司法厅写了一封致李如林、彭矛二厅长的信。我递上此信和申请书，至今未获答复，后来得知二妹古稀之年查出癌症，我只有劝她放弃此事，安心养病。

七、尾声

为祖父和父亲，我们经过多年努力未有结果，这时我已是八十三岁的高龄老人了，如此奔波实感力不从心。况且，自2007年以来，我患下步履维艰的后遗症，不得已只好放弃努力，抱憾暮年了。

迟暮之年重新认识祖与父，我感到父亲一生在祖父羽翼下成长为职业军人、国军战将，是绝对忠于职守而其出发点却是笃守孝道的。若不是孝顺祖父，本来厌倦戎马生活在他，在抗战胜利后是可以解甲荣归，回到他刚建成的宅第之中，安享清福的。可是，为了遵父命，他又率部出征，投入内战。他被俘后，本来有功可赎，没想到又受到祖父的牵累，而终至殁死狱中，其孝固愚也。

我与祖父的接触比父亲多，对他的经历也十分敬重。为了给祖父昭雪，我尽了自己的绵薄，但因长官意志与官场痼习而终未成功。我此生是不能为祖父和父亲讨一个公正的说法了。趁一息尚存，我将事情之本末记录于此，既表吾心，亦可为后人留一面镜子。

2009年于北京

【检讨与交代】

我和杨炳炎的关系

周文英

第一次我和杨炳炎的认识，在前年，62年的下半年，在解放电出来在夫子庙他和我一同走到中华路，杨问我家住什么地方、家里有几个人，我回答家中四口人，一路走到中华门外，我问他家有什么人，杨回答我老婆死了，就有两个孩子，后来到雨花台石头上面两人谈了，问我还有丈夫，我回答有是有，就是有其名无其实，比我大十几岁，在共产党领导下还是不合理的，解决不了。杨回答我你没有问，象这样的婚姻好解决得很，要是以后解决下来跟我做老婆，你也是两个孩子，我也是两个孩子倒是满好，以后经常的上来，住在我这里每月半月在家，半月在城，我每月再给你几个钱生活上不是很好，就是户口等不上来的话，同时就提出和我发生关系，就在雨花台上面石头上就玩我身上，一□就在那时就腐化了一次，后来下了雨花台下面中华路车站时给我两个粮票，叫我明天在新街口等坐车，再到中山陵去玩。后来到了中山陵就先吃了饭，吃了一斤米饭买了三样菜鱼、鸭子、肉丝共三元多钱，吃过饭后就上中山陵上面玩了一时就下到了左边的草的上就谈了，等下回来买两个猪带回去养，同时再带几个钱，就在这时又腐化了一次，后来就两人坐汽车到新街口我就回来了，后来我就不在家了。

在今年四月份我上南京去看眼睛回来时走到新街口下车他骑了车上在那边就看见了我就叫文英当时，我就□□车就谈了□□□前年□你信为什么不来，我回答没有收到，你连地名都不给我，当时就写了地名给我，叫我下回□来成我就走了。

在五月份写下一信，叫我五一上车玩，我是没有去，因为乡下大风吹倒房子我就回了一信没有时间，同时房子要修，要一百元大家帮助请他同我借□几元钱，几天内□回了我信现在没有，叫我5月17号在大华门口七点到，等他，我以去了等到晚上七点多时候杨炳炎也来了，我同他在他对面吃了两个面，他吃了肉面我吃了鱼面，共计6角钱，后来又给了我五元又买了两斤饼干。杨炳炎同我到八点半□□要到□不能同我去弯，明天叫我到汽车站买票买□时票，我就买了

下午四点的票杨炳炎在□时也到了车站后来我同他一路又到雨花台上面草地上坐了又谈□谈起，不然叫我住他家一个时期因为在学习中不能叫我不要见他的毛著学习期间，过了一定带我住他那里一个时间，我也□□了，就在那时就在草地上又是第三次腐化后上了雨花台上面石头上有做(? 坐)了一回，就又给我五元钱，谈了我问他学习是什么，他回答我讲不清，后来就一同又到了车站他就走了，我就回来了。在8月份又来了一信，叫我去玩，要我带持几斤米，我因有病就未去了。

在本月6日杨炳炎又来到我家同我谈了，叫我有来人问就回□是前□老新叫我关系之事不能讲就是死也不能讲他来过，这是他的□想我也不会□同他走这条出路了，我是一一说明。

龙都公社秦淮大队一队

社员周文英亲笔写

1964年10月8日

(沈迈克提供)

【来信选登】

1、胡庄子转来“雄师”负责人的来信

《记忆》编辑部：

我的《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在《记忆》总第39期发表后，“雄师”的主要负责人周平曾致信于我，补充了“雄师”的有关情况，见《记忆》总第41期。近日，“雄师”的另一个负责人冯正永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明确了“雄师”的几个问题。征得本人同意，转给《记忆》杂志，或许对关心和研究“雄师”的人有些价值。

冯的全文如下：

本人：冯正永。回答你文中的几个问题。

1. “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

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实际我们当时认为，中央文革是背离毛路线的。

2. “雄师”成立于何时？

正式成立在1966. 12. 30，宣读并通过了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雄师”的名称也是那晚决定的。但是在成立雄师之前，有过大约半个月的准备，也就是讨论起草《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参加讨论起草该文的有冯正永、许大正、周平、赵蔓军四人。当时的教师朱军没有参加讨论，但是他介绍了周平和赵蔓军来与我交换观点，而交换观点的结果就是决定成立组织，写大字报。讨论后，我负责起草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直接拿到1966. 12. 30会上，一致同意，没有修改，就发表了。

3. “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

雄师成员有约30人。主要者为冯正永，周平，许大正等。雄师成员主体是由“643”（周平、万庆友、杨恒祥等）和“644”（冯正永、许大正、姜作勤等）两部分人，其他各系和年级人数都比较分散。陆仁安、葛胜宝都不是雄师成员。陆仁安我当时就知道，他的观点与雄师接近。

最后被拘留的有：

朱栋培（朱军）【因为他是组织中唯一的教师，但是他没有参加雄师的正式

活动。他自己成立了“孙悟空”战斗队，一个人的战斗队。他的文章主要是小品类。文革中常常要把“反革命”组织说成是受人操纵的，所以就找一个教师。】

冯正永、周平【雄师主要两篇文章的作者，雄师的组织者】。

江晓东、黄晓光【雄师一般成员。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在文革前曾有过与当时环境不合的言论。为将一个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把他们俩说成雄师骨干。他们为雄师坐牢，实在是冤枉。】

胡庄子

2012-9于北京

2、阎长贵致李英美信

李英美同志：

我和你不认识，但我很赞成你说的“摆事实讲道理”，搞历史最重要或者说首要的就是“把事实搞准确（不管观点如何）”，这是最基本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大作采取的态度和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毋庸讳言，现在不少人缺乏这种精神。对唐伟的文章我是说了好话（指他的一些论断）的，也提出他文章中的若干事实不对或不准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清华人。我觉得你和唐伟都是很有才的，如能取长补短，互相切磋，不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和历史都有好处。清华确实是出人才的“摇篮”（或之一），人们常说清华“治国安邦”，我们几届领导人中，好几位都是清华的，下一届领导人还是清华的，恳切希望清华培养出来的人，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满足人民的期待和希望。话扯远了，拉回来。我看到，大作仿佛还有几件事实不确：1、王力、谢富治1967年7月22日被救回北京，不是在南苑机场，是在西郊机场；2、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不是8月26日，而是8月30日；3、戚本禹被捕不是1968年1月14日，而是1月12日。读了大作，随便说了这些话，请原谅。谢谢你的大作。

祝好！

阎长贵11、2

3、秋山枫叶谈李英美文

《记忆》编辑部，好！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期《记忆》“导读”中的这句话很有意思。读完了李英美《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兼评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之误》之后，更觉得这一导读意味深长。

李英美的文章火药味儿十足。看完文章，且不论观点如何，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某些人对不同观点，或者不同研究方式的讨论，总是有一股情感上的“冲动”，语气总像在“打仗”，甚至有点“你死我活”。没必要的吧？为什么我们的学者探讨切磋问题时，就不能温和一点呢？

另外，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五四，爱国等问题的观点也不是多么的客观，照我看来，也就是“党化教育”的那一套。倒是唐伟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还有一些独立思考和还原历史的意思。我认为，至少是对100年前的那些事，应该有一个更宽阔的视角。这几个月，我天天在读讲述民国那段历史的书籍。李新宇的，张鸣的，雪珥的，他们三人分别从思想、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角度研究清末民初的历史，史料丰富，也很有见地。一口气读了十来本这些，再看李英美对唐伟的反驳，更觉得研究历史不能太武断专横，以为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这样的态度很可笑。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

秋山枫叶

2012年10月31日

于荷兰 鹿特丹

4、李英美来信

《记忆》编辑部：

感谢贵刊登载本人短文《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感谢阎长贵先生在文章刊出后给我提出宝贵意见，阎长贵先生指出：“戚本禹被捕不是1968

年1月14日，而是1月12日”，我相信阎长贵先生的说法更准确，因为他当时最知情。阎长贵先生还指出：“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不是8月26日，而是8月30日”。阎长贵先生所说与《王力反思录》中王力本人说法相同，对此，我未在文中说明，是我的疏忽。至于我引用的资料，张子申著的《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关于毛泽东决定端出王力、关锋的内容，实际是我从《毛泽东传》里摘引的，内容与《周恩来年谱》基本相同。当时我没引用《王力反思录》也有我的想法，因为《王力反思录》出版后，关锋和戚本禹对此书特别反感，说王力往自己脸上贴金，书中许多内容不实。因此我就从《毛泽东传》里摘引了一段。文化革命的诸多细节问题已成为最费心神，最影响判断的关键，本人欢迎批评指正。

特此感谢。

李英美

2012年11月9日

